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96 學年度高二人文社會資優班專題研究

北伐的戰略與對蜀漢政權影響之研究

研究者：周靖安

指導老師：黃文斐老師

初稿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四日

摘要

杜甫詩云：「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蜀漢，之於中國數千年歷史洪流，其國祚實屬短暫；且蜀漢國土僅屈居中國一角，縱背負劉氏正統之名，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個地方政權。然而，兵源拮据、小國寡民的區區蜀漢，面對勢力遠在其上的曹魏，不僅未採取消極的守勢、反而以積極擴張的態度，發動數十次的北伐。綜觀各國歷史，如此個案都是極為少見的。

諸葛亮與姜維的北伐，從古至今看法兩極。多數人感佩諸葛亮對劉備的忠貞死節、姜維義無反顧回報諸葛亮知遇之恩的精神，北伐又是實踐重振漢室的手段，許多人對此皆給予肯定的評價。然而，亦有部分學者就北伐未取得豐碩戰果的歷史事實，批評北伐行動耗損蜀漢國力、反招致滅亡。關於此議題，正反雙方各有其論述，對於歷史的詮釋角度也不盡相同。筆者認為，唯有透過文獻重新掌握最接近事實的歷史情形，才能對北伐行動作出全面而客觀的評價。

本研究的第二章，首先解析自猇亭之役的重創後，諸葛亮如何在短短五年內重新穩固三國勢力均衡，更使蜀漢具備足以討伐魏國的軍政實力。第三章依序分段敘述諸葛亮的北伐過程，並以筆者的觀點解讀諸葛亮的決策、戰略規劃、乃至行動失敗的關鍵。第四章剖析諸葛亮死後的蜀漢權力架構，敘述姜維等人的對外擴張思維和方針設定，最後分析蜀漢滅亡的原因。第五章比較北伐的得失關係、解讀這項軍事行動對於蜀漢的各層面意義，最後對於北伐作出整體評價，回歸本研究的核心。

關鍵字：北伐、蜀漢、諸葛亮、姜維

篇章架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北伐前的局勢

第一節 存亡之秋的蜀漢

第二節 諸葛亮的復甦政策

第三節 平定南蠻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諸葛亮的北伐

第一節 第一次北伐

第二節 第二、三次北伐

第三節 第四次北伐

第四節 第五次北伐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後諸葛亮時期

第一節 後諸葛亮時期的政治局勢

第二節 後諸葛亮時期的北伐

第三節 鄧艾與鍾會的入蜀行動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北伐行動的評價

第一節 北伐行動的得與失

第二節 北伐行動的整體意義

第三節 論北伐行動與蜀漢政權的關係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白帝託孤佐幼主，鞠躬盡瘁報先恩。蜀漢章武三年(西元 223 年)，諸葛亮在白帝城永安宮接下劉備遺旨，奉命輔佐年幼的後主劉禪，同時也承繼了劉備一生的夢想—興復漢室，以定中原。諸葛亮以燃燒自己生命的方式、報效劉備的知遇之恩，千百年來令多少人熱淚滿襟，也傳為忠義君臣的模範代表。面對雄踞大半天下、兵多將廣的曹魏，諸葛亮帶領蜀漢以僅僅一州之資源，與之抗衡。這種以寡擊眾、以少敵多的氣魄，這種追求理想、忠於先主的德操，儘管被部分學者批為「封建思想洗腦下的產物」¹，其不畏艱難、勇於挑戰的精神依然值得世人欽佩、學習。

然，拋開情感層面，試想：蜀漢真的需要諸葛亮鞠躬盡瘁的北伐嗎？或許長久以來，人們因推崇諸葛亮以前朝遺老身分、為國家奉獻的畢生之力的忠貞形象，進而認同其主導的北伐行動，而忽略了現實層面，即北伐是否真的為蜀漢帶來益處？亦或只是引導蜀漢踏上滅亡之途？

經過幾個月的文獻回顧、資料閱讀，筆者發現此議題大有討論空間。首先，身為蜀漢政權的實質執政者，當面臨外在環境變遷以及內部情勢更動時，諸葛亮時常擁有多種可能的選擇。除了假設性地討論不同選擇所帶來的可能結果，筆者亦試圖在研究中理解諸葛亮選擇的原因、動機、考量與預期心理。第二，諸多學術前輩的研究與評論，觀點相異、切入角度也各自不同，所作出的結論，正面與負面俱有。筆者希望能在拜讀眾多前輩大作之後，藉由比較其論點與陳述，綜合出最合情合理的評斷。最後，筆者期待透過諸葛亮經營蜀地、規劃北伐的過程，學習其在領導團隊、統合政策的智慧。

第二節 研究問題

筆者認為，若要對北伐行動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對於北伐的環境背景、動機、策略規劃、戰術執行乃至結果具備清楚透徹的認知與了解。故本研究將仔細考據諸葛亮在北伐前所規劃與執行的前置作業、經營政策，了解北伐前的蜀國情勢，以求體會諸葛亮所面臨的抉擇與障礙。之後透過對個別北伐行動的計劃研究，比對不同時期北伐的策略轉變、戰術修正，配合史料記載與二手文獻說明，解釋北伐策略與大環境的關係。針對諸葛亮去世後，分析蜀國的政經局勢、權力架構，以及後期執政者所策畫的北伐行動。綜合以上論述，比較諸葛亮和其後繼者引導之北伐的差異、兩系列軍事行動的整體貢獻與影響，給予個別評析與評價；探討北伐對於蜀漢政權，實質和精神層面的意義；最後總結北伐行動對於蜀漢政權整體，究竟是利多於弊，亦或反之—即為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找出答案。

第三節 研究限制

關於三國的相關文獻，以對岸學者作品為多，故一般市面上不易尋得文本。所幸相關文獻於國家圖書館中皆有存本，以解決此問題。然部分學者的論調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觀點過於激進而主觀，其主張與評述若加以引用，恐有失客觀中立的研究精神。故筆者在閱讀相

¹ 參考周一良〈論諸葛亮〉(《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北京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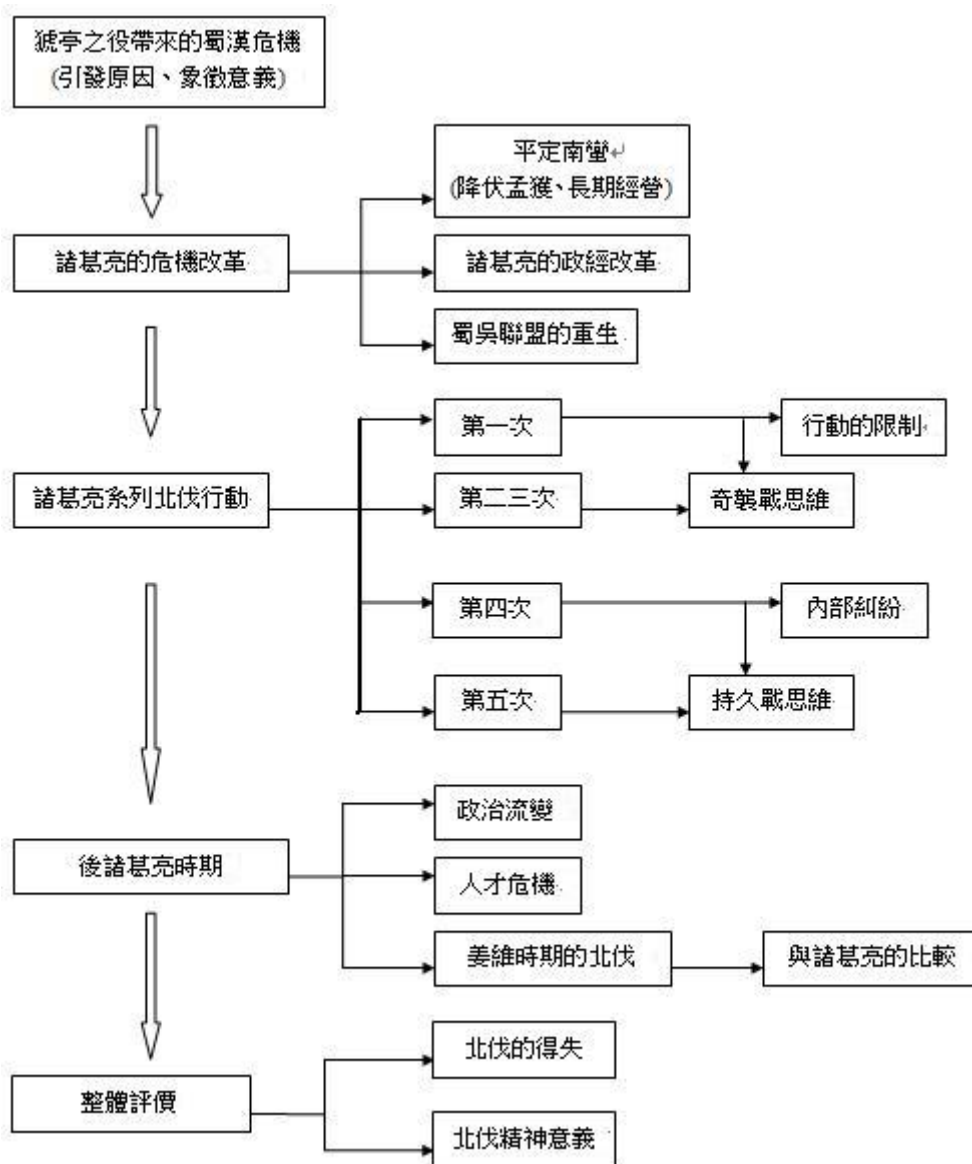
關資料時猶需審慎篩選、考核，取適於參考之處，以期完成一篇具說服力又公正的專題研究。

第四節 名詞界定

為強化本研究的嚴謹性與精確性，筆者將「北伐」的範圍限定為始自蜀漢建興六年蜀漢丞相諸葛亮首次出兵討魏、終於蜀漢景耀五年蜀漢大將軍姜維為魏將鄧艾所敗，歷時共計 34 年的數次征伐行動；「蜀漢政權」則定義為始自西元 221 年，蜀漢昭烈皇帝劉備以繼承漢室正統為名於益州稱帝，終於西元 264 年蜀漢懷帝劉禪於成都出降鄧艾，凡二主、共四十三年之獨立政權，其過境範圍涵蓋今日四川、雲南、貴州北部、陝西舊漢中府一帶。

另外，為方便研究敘述，筆者自創「後諸葛亮時期」與「姜維集團」兩個詞彙。所謂後諸葛亮時期，筆者將其定義為涵蓋諸葛亮死後至劉禪出降(234~262)的二十九年，由於這段期間的執政者大多為諸葛亮在世時所培養的行政班底，故以後諸葛亮時期稱之；姜維集團則係指後諸葛亮時期，以蜀漢大將軍姜維為領導核心的向外擴張軍事結構。

第五節 研究結構



第二章 北伐前的局勢

第一節 存亡之秋的蜀漢

東漢建安二十四年(西元 219 年)，這對蜀漢政權、東吳政權乃至於三國時期的中國全局而言，都是舉足輕重的一年。該年春天，蜀漢討虜將軍黃忠於定軍山大破來犯的魏將夏侯淵；蜀魏雙方對峙良久，及至夏天，曹操以屢攻不下、逃亡者日漸眾多而撤退，蜀漢於是將漢中納入領土；²同年秋天，蜀漢前將軍關羽亦於樊城擊敗魏將于禁、斬殺龐德，聲名威震中原地區。然而，孫權卻利用荊州空虛之時，暗地策動麋芳、傅士仁反叛，並遣軍迅速攻陷江陵等地；關羽軍團遠在樊城，又受徐晃軍牽制，撤返時遇吳軍迎擊，蜀軍潰散，關羽與其子關平被斬於臨沮。³至此，可謂三國時期的重要分界點：自赤壁之戰以來的蜀吳共同戰線，終於在荊州歸屬的議題上爆發大動干戈的競爭。東漢建安二十六年(西元 221 年)，因荊州搶奪戰引起的猇亭之役，不僅成為蜀漢建國以來的最大挫敗，更隱含了足以撼動蜀漢根基的巨大危機。

2-1-1 猇亭之役的起因、過程與結果

有關劉備發動猇亭之役的原因，諸多學術前輩已提出不同的觀點與解釋。一般認為，若僅以「雪恥」的情緒性理由、或單純就劉備「忿孫權之襲關羽」⁴作為出師的動機，並不能全面地說明猇亭之戰真正的觸發原因。若要對於猇亭之役的起因作深入而詳實的剖析，則必須回溯至《隆中對》，亦即從諸葛亮為劉備量身打造的基本國策說起。

諸葛亮於臥龍崗向劉備提出著名的《隆中對》，其中評估曹魏、孫吳兩方的實力，認為不可圖之，於是建議劉備取劉表之荊州、劉璋之益州，建構集團立足基礎，「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一旦時機成熟，即遣一軍自荊州向宛洛，劉備則親領大軍出秦川，兩路夾擊曹魏。⁵也就是說，蜀漢發展的最佳策略，即是利用跨足荆益二州的地理優勢，同時威脅襄陽、長安兩處曹魏軍事重鎮；兼與孫權建立聯盟，以共同軍事行動向曹魏施壓。

這套戰略確實有其可行性，但亦有隱藏的障礙與實際運作困難。就事實而論，最大的阻礙顯然是荊州問題。荊州位處交通要衝，四川與江東的過度地帶、北面通往司隸區等中原精華地區，實屬兵家必爭之地；更重要的是，對於孫吳政權，荊州涵蓋了長江上游的範圍，取得此處方能「竟長江之所極」，確立其以水域作為天然屏障的防禦策略。無可避免地，荊州既屬《隆中對》的蜀漢必須取得的資本、又是孫吳力圖據有的疆土，面對這種現實利害的利益衝突，⁶一旦處理手段不當，即會造成聯盟內部的惡性競爭甚至兵戎相見。不過，筆者認為並不能將此視為《隆中對》的盲點，荊州之爭實有和平化解之契機。且不論關羽斷然拒絕孫權為子提婚之請、侮辱來訪之使一事，倘若劉備初入蜀時採納龐統之計、一舉擒殺劉璋，則亦不必自荊州召回諸葛亮；若江陵由諸葛亮親自坐鎮，則蜀吳雙方在荊州方面的交涉必能緩和許多，亦不至演變為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

荊州領土糾紛終演變至軍事交鋒，猶有另一原因，即蜀吳聯盟內部的勢力平衡關係。⁷東

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關張趙馬黃傳〉

⁴ 周一良〈論諸葛亮〉，前引書

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⁶ 李奇龍《孫吳政權興亡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55

⁷ 宗樹敏《諸葛亮治蜀之研究》，台灣書局，1994年，台北市，頁96

漢建安二十年(西元 215 年),孫權以劉備已取得益州為由,遣使索求荊州;劉備應之以「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作為答覆。孫權大怒,令呂蒙領軍奪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劉備則親率五萬兵馬前至公安、遣關羽進入益陽,戰事一觸即發。⁸適逢曹操破張魯於漢中,劉備益州領土受到威脅,只得與孫權談和,平分荊州領地。這次的聯盟危機其實正是對於蜀吳雙方的警訊,而孫權在這次和談中放棄了奪取的零陵,心中自然不甚滿意。

如果蜀漢方面能及早注意到此議題之嚴重性,猶有機會扭轉結局;只可惜劉備忽略了平衡聯盟內部勢力的重要性,更未曾體悟到,孫吳在蜀漢取得上庸、漢中兩地後,再次承受到相對弱勢的壓迫。⁹可惜蜀漢未能對這項議題採取有效改善措施,造成孫權利用關羽北進的機會趁隙而入。

不過,縱然荊州之爭確實是引發猇亭惡戰的導火線,真正使之爆發的火苗,乃是蜀漢最高統帥—劉備的態度。藉由既有文獻,可以大致揣測劉備當時的心理狀態。一般最通俗的說法是劉備與關羽雖名為君臣、情實同骨肉,荊州淪陷、關羽被害,劉備聞之後傷心欲絕又憤慨難消,因此不加思索地發動大軍、為關羽復仇。以上說法的確符合《三國志》記載,然若僅以這套理論概括劉備出師夷陵的原委,就太小看劉備這位人物了。且見《三國志》:

(曹丕)詔問群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劉)曄獨云:「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是必用眾以示其有餘。」¹⁰

筆者認為劉曄的推論並不無道理。劉備向來以「興復漢室」作為其政治號召,他所強調的是延續劉氏的天下,建立蜀漢亦為了興師勤王。再者,當時劉備已稱帝,為維持其政權之正統性,他必須討伐逆賊以樹立威信;孫權擅自攻擊蜀漢國土,正如同對於漢王朝皇權的侵犯,身為漢室維護者的劉備予以討伐自然也是義不容辭。至於為何甘冒背離隆中路線¹¹、破壞蜀漢國家政策的風險,親率大軍討伐東吳呢?從文獻記載上並無法得知直接原因,因此或許只能推論,乃因劉備自信具備足以征服東吳的實力。¹²

吾人多云猇亭一役乃陸遜以寡擊眾的經典戰事,然事實上並非如此。張大可先生於《三國史研究》中即指出,《三國志》各傳及裴註皆未記載劉強孫弱,若就事實考量,蜀漢失去荊州後國土縮水近半,更失去了荊州地區的物產、兵員等資源;猇亭一戰縱然蜀漢傾全力出征,所領亦不過一州之兵。¹³何況劉備攻打四川時時運不濟且操作不當,奪下益州後編戶數竟大幅銳減近五成,其兵力亦僅夠維持北部防線;¹⁴取得漢中前,曹操又已強制漢中居民八萬餘口遷徙至關中。由上述證據可知,蜀漢在猇亭之役的雙方軍力上不僅未居優勢,更可能是處於不利的位置;尤其蜀軍遠征,沿途留守部隊眾多,登上第一線與吳軍交鋒的實際軍力想必更是少之又少。不過,蜀軍亦有其優勢:劉備以帝王之尊親臨前線、士氣必然高昂;攻擊位置居高臨下,且蜀軍士卒多擅於山地作戰;¹⁵另外,劉備更遣使利誘東吳地區的武陵蠻夷,以錢財、官爵煽動其響應蜀軍攻勢。

⁸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⁹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蘭州市,頁93

¹⁰ 陳壽《三國志》〈魏書·程郭董劉蔣劉傳〉

¹¹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張先生將諸葛亮的隆中對策成為隆中路線。(頁156)

¹² 馬植杰先生於《三國史》中指出,劉備之所以發動猇亭之戰,主要原因不是「忿」,而是「驕」,認為自己雖不足以伐魏,但對付孫吳是頗有餘裕的。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市。

¹³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95

¹⁴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82

¹⁵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98

蜀漢章武元年(西元 221 年)七月，蜀軍開始向吳軍發動攻勢。蜀將吳班、馮習會同水陸兩軍，於前線巫縣、秭歸二處擊破吳將李異、劉阿的部隊；次年正月，劉備親率大軍進駐秭歸，命令吳班、陳式領水軍屯駐夷陵。至此可謂戰爭前期，由蜀軍採取主動攻勢，東吳除了由大都督陸遜執掌兵權、率軍五萬前往夷陵與蜀軍對峙外，並無動作。不過，由陸遜上疏言：「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¹⁶，可以推測夷陵應是陸遜設定的兩軍決戰地點。蜀漢章武二年(西元 222 年)二月，蜀軍繼續推進，延山嶺前進至夷道猓亭駐紮，鎮北將軍黃權奉命統領江北諸君，一方面與吳軍對峙、一方面防範魏軍南下。此時，蜀軍已連營數十屯，沿途駐紮長達數百里，兵力分散於崎嶇山地，不僅無法組織集中的作戰體系、一旦受到攻擊也難以互相支援；¹⁷反之，吳軍主力至此仍按兵不動。兩相比較，蜀吳雙方的勢力正悄悄地轉變。

身為東吳新秀的陸遜，統領的大多是孫策遺留的部屬以及孫吳貴族，眾將多自負且不服號令，對於陸遜的領導亦多有怨言。¹⁸但陸遜態度堅定、軍令貫徹，吳將孫桓與蜀軍前鋒作戰失利受困，陸遜為保持主力集中並未出兵相救。除了陸遜所言：「安東(孫桓字)得士眾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的肯定，陸遜更深諳即便夷陵失陷，蜀軍面對孫桓的指揮有度必然得付出慘痛代價，屆時吳軍以逸待勞、予以反擊，必能獲勝(誠如其言：夷陵亦得復易失)。¹⁹蜀軍發兵已達九個多月之久，吳班誘敵之計為陸遜所識破，更顯示蜀軍已是無計可施、強弩之末。陸遜遂料蜀軍已是「兵疲意沮」，認定決戰之刻即將來臨。

根據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中記載，吳軍首次發動攻勢是陸遜下令攻擊一個軍營，但攻擊行動失敗。吳將多抱怨陸遜白白葬送士兵性命，孰料陸遜竟言：「吾已曉破之之術。」²⁰以其後陸遜採火攻方式突襲蜀營，第一次攻擊主要作用應為探查敵情，從而決定全面攻擊時的主要戰術。時值六月炎暑，且夷陵處有東南風入峽，陸遜在試探行動中想必察覺蜀軍似乎並無防火準備，終於決定採取火攻。於是吳軍軍士各持茅草，以火攻奪取蜀營；火攻既成，吳軍各路同時進攻，以密集的優勢兵力擊破蜀軍前鋒，統帥張南、馮習等人死於亂軍之中；²⁰劉備部將杜路、劉寧等人被迫請降；江左督軍黃權則帶領殘餘三百士卒投靠曹魏。劉備率軍撤退至馬鞍山，試圖倚恃險要地形以敵吳軍；陸遜督促部隊四面夾攻，蜀軍防線完全崩潰，死傷萬餘人。劉備乘夜遁逃，至秭歸縣收合殘兵敗將，由陸路向永安逃亡。一路上遭吳將李異、劉阿追擊，在隘口燃燒丟棄的盔甲方遏阻追兵，劉備才得以逃入白帝城。²¹

猓亭之役至此正式結束，蜀國隨劉備入峽的遠征軍幾乎死傷殆盡，國力大傷。經此一戰，荊州歸屬糾紛亦宣告落幕，蜀漢勢力完全退出荊州地區、東吳則成功建立完整的防禦戰線。撤退至白帝城的劉備，心中憤怒又羞愧，竟因此病重且一蹶不振，隔年即於永安宮將政事託付予丞相諸葛亮，撒手人寰。蜀漢政權建立僅三年(始自劉備稱帝)，先失去荊州，又逢猓亭之役的慘重死傷與劉備駕崩，國勢之岌岌可危、國內之人心惶惶，從漢嘉太守黃元的造反可以略知一二，而蜀漢無疑正面對其建國以來的首次重大挑戰。

¹⁶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¹⁷ 馬植杰《三國史》，前引書，頁 116

¹⁸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陸遜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

¹⁹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102

²⁰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100

²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2-1-2 蜀吳反目的象徵意義與所面臨的可能

蜀吳同盟的起始點為赤壁之戰，同盟本體也是因應赤壁之戰而生的；換句話說，蜀吳雙方的盟約開啓了赤壁之戰的大門，也揭開了三國鼎立的序幕。孫權和劉備的聯合戰線事實上是為情勢所迫：面對曹操龐大軍勢的壓迫，除了誓死對抗曹操的劉備集團之外，孫權也找不到第二個戰友了；至於劉備方面，由於聯吳屬諸葛亮《隆中對》中的「外結合孫權」，因此當諸葛亮出使東吳時，雙方一拍即合。²²這種因外力而結合的共同關係並不堅韌，其中內部的均勢問題前文已有所述及；造成聯盟分裂的另一原因，或許與孫權本身的態度有關。萬穎中在《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提及：

（蜀漢的）「橫跨荊益」的戰略目標必須建立在孫、劉雙方合江南之力以北拒曹魏的政治基礎上，假如有任何一造純粹顧及集團本身的利益而不能認知此共識，並做出有損地區全力均衡之舉動的話，這個目標不僅不可能實現，且雙方都會因此陷入惡性競爭。²³

萬先生指出，孫權對於江南聯盟的概念缺乏認同，從其屢次向曹魏稱臣以求得個體利益的舉動中可知一二；然而劉備卻相當清楚自身所處的狀況、也明白蜀漢的相對弱勢，因此面對荊州歸屬議題時，劉備多能在不背盟約的前提下，找出維繫整體共識之道。²⁴

不過，筆者認為不能全然站在蜀漢的觀點思考這項議題。許多學者咸認為，孫吳之所以渴望戰據荊州，乃因其力圖鞏固長江南岸的領土、構築完整的防禦系統；也就是說，在對於國家發展的概念上，相較於劉備、諸葛亮地積極進取，孫權是處於相對保守的。部分研究前輩認為此係孫權個性使然，但從孫權在赤壁之戰表現的深謀遠慮、合肥之戰時的驍勇果決，筆者並不認同這種解釋；另有一說是因孫吳政局中保守勢力的抬頭，使其保持不具明顯立場的政治態度。²⁵筆者未能在原典文獻上尋獲關於此說法的直接證據，不過由赤壁之戰前，東吳以張昭為首的文官集團所持請降態度看來，東吳政權內部確實存在一股保守的主和勢力。

但是，就孫權執政以來對合肥先後發動四次攻勢的事實而論，東吳確實具備北進之心，也並非僅期盼雄據一方的地方政權。由此推論，孫權既有與曹魏爭奪北方的企圖，其進軍路線就顯得相當重要，而此議題正攸關荊州的地理重要性。且看孫權屢攻合肥不下，乃因合肥居於陸，東吳軍士多擅水戰，在陸上作戰方面顯然不如慣於平原戰爭的曹魏將士。若孫權放棄荊州領土，則僅能從建業方面北上徐州，勢必得面對陸戰的問題；然若東吳占據江陵，則可由此向襄陽等處發動攻擊，水戰於此處猶具優勢，此事已有劉表政權之先例。綜合上述所言，筆者認為荊州對於孫吳而言不僅具備防禦重鎮的角色，更是向北部發展的前線基地。

蜀吳聯盟的內部衝突漸趨白熱化而終於爆發，自赤壁之戰以來的合作關係至此終結。猗亭之役開戰前夕，孫權為避免曹魏自北伐發動突襲，以謙卑的態度向曹丕稱臣、進貢大量物資示好並表達誠意。有鑑於此，筆者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即孫權有沒有可能自此與曹魏共同組成新的作戰聯盟呢？倪振金先生在其碩士論文《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之研究》中，藉由三位體(Triad)與權力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架構，對於三國策略同盟的思維進行探討。文中指出，以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勢，理論上而言，應有兩種同盟出現的可能性：一種乃是

²² 李奇龍《孫吳政權興亡之研究》，前引書，頁 45

²³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81

²⁴ 李奇龍《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82

²⁵ 倪振金《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頁 177

最強國拉攏最小國，另一種則為次強國聯合最小國抵抗最強國(在此情況假設中，次強的兩國聯盟將強於最強國)。²⁶然而第一種情況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乃因魏蜀的政治立場處於絕對敵對，其合作的可能性趨近於零。另一方面，孫吳也不太可能與曹魏進行長久聯盟，若與之結盟，則次強者必受制於強者。²⁷由倪先生的結論可知，蜀吳聯盟儘管歷經夷陵激戰的破壞，其存在依舊是必要的。再者，吳魏雙方因「質子問題」所引起的糾紛亦是兩國之間難以排解的障礙，因孫權深諳茲事體大，且極有可能影響東吳的自主性。

荊州歸吳後，東吳免除來自西邊的威脅，使其得以專心對付曹魏，應也是促使孫權決心與魏決裂的原因。²⁸以上理論從猇亭戰後孫權迅速遣人與劉備講和，²⁹及西元 222 年曹丕因東吳遲遲未送質子入魏而發動三路大軍討吳、孫權因蜀吳決戰已終而據江待敵一事看來，孫權對於蜀吳聯盟存在的必要性亦有相當的認知與了解。

²⁶ 倪振金先生在論文中推估蜀漢當時的戶數約為二十八萬，之於孫吳的五十二萬、曹魏的二百四十五萬處於相對劣勢。以軍力而言，蜀漢異於吳魏兩方，缺少軍戶的編制。就客觀事實而言，蜀國部隊編配仍遜於吳魏二國，客觀認定仍屬軍力最弱勢的一方。(頁 74)其三位體的理論係構築於三國國力以魏國最強，吳國次之而蜀國居末的基礎之上。

²⁷ 倪振金《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之研究》，前引書，頁 81

²⁸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103

²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第二節 諸葛亮的復甦政策

劉備愕然的崩殂對於連逢重挫的蜀漢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自劉備手中接下輔佐後主重責大任的諸葛亮，面對風雨飄搖的國勢，想必更是舉步維艱、如臨深淵。蜀漢雖與東吳暫時講和，猶談不上恢復原先的聯盟關係；北方的曹魏更是虎視眈眈，隨時有進犯入寇的可能；蜀國境內更是一片恐懼，叛亂頻傳。身為蜀漢最高行政負責人的丞相諸葛亮，如何以五年的時間讓蜀漢恢復國力、重新開啓對魏的討伐行動呢？

2-2-1 蜀吳聯盟的重生

諸葛亮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在這瀕臨滅亡之際，為蜀漢尋找、甚至創造一條足以延續國祚的活路。由於劉備政權入蜀未久，地方勢力猶未完全臣服，加之接連的兵禍戰亂，使蜀漢政府疲於安撫動盪的人心；此時，一旦曹魏發動南下入蜀攻勢，以其兵員數量的優勢，蜀軍恐怕無法抵擋。應是基於以上原因，諸葛亮經過審慎考慮之後，體認到當時惟一猶能支援蜀漢的力量，即是舊盟友孫吳。於是，諸葛亮回歸到《隆中對》所言及的「外結好孫權」策略，重新啓動蜀吳之間的合作機制。

首先，吾人必須了解蜀漢「聯合東吳」的戰略本質。倪振金在《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之研究》中，以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國家目標(National Object)、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與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對於蜀漢的聯吳戰略作了統整性的分析。所謂國家利益，即國家人民對於國家定位的想像與期待，蜀漢一向設定為「匡復漢室」的價值概念；而完成此理想的必備條件(即國家目標)就是掃平群雄以尊王室。蜀漢集團以上述二點為基礎，制定最適當的手段與方式，也就是諸葛亮於隆中對規劃的：佔有荊州→外和孫權→待天下有變→兩路討魏。³⁰於此，倪先生認為蜀漢的國家戰略必為聯吳制魏無疑，在蜀漢的戰略思維中，北伐討魏是達成其目標的必要手段；而諸葛亮身核心參謀(在後主時期甚至為主要決策者)，聯吳的策略更是構成其北伐行動的重要因子。總而論之，諸葛亮最初為劉備規畫平定天下大計時，乃是以「三分天下取其一」的概念作為與曹操對抗的基礎，而聯合孫吳則是剷除曹魏的進階手段。³¹蜀吳共同戰線是面對曹魏的必然策略，藉由兩國的多面牽制作戰，方能使人數眾多的曹魏軍團疲於奔命、顧此失彼，以圖創造蜀吳兩國的實質利益。

本章上一節已探討了蜀吳聯盟存在的必然性，以此可知「共同戰線」的概念其實是蜀吳兩國主政者心中共存的默契。然而，經過猇亭一戰的洗禮，此時迫切需要聯盟復原的是戰敗的蜀國，若以一般的外交方式向東吳求和，則孫權必然趁此良機向蜀國索求實質利益，或是要求交換條件。如何讓孫權承認聯盟的必要且自發性地與蜀國復盟，正是諸葛亮在遣使與東吳締約前所面對的難題。適逢尚書鄧芝來訪進言，與諸葛亮心意一拍即合，於是遣其訪吳修盟。³²孫權果然對蜀漢復盟之請猶豫不決，鄧芝不負諸葛亮所托，除了幹練的外交口才，鄧芝更以精闢的論點解釋蜀吳聯盟的重要並排解孫權心中的踟躕。鄧芝並不否認聯盟內部將依然存在合作之外的競爭成分，從他與孫權的對話中可略見一二。鄧芝掌握了這層微妙的關係，

³⁰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戰略的指涉範圍不僅限於「使用會戰為手段以求達到戰爭目標」，而應涵蓋政治、軍事、經濟，並作出綜合的指導以為政策的執行工具。頁 133

³¹ 倪振金《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之研究》，前引書，頁 116

³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鄧張宗楊傳〉：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吳思之久矣，未未得並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

對孫權進行一套相當具有說服力的利害陳述：他直指魏吳的「質子問題」，讓孫權不得不細思蜀吳合作的必要性，同時也使其面對魏吳合作的矛盾和吳國的利益評析。經過對蜀國態度的試探、鄧芝的誠摯勸說，孫權終於決定和蜀漢長期合作，自此蜀吳聯盟也終於正式穩定下來，直至蜀亡。³³

儘管鄧芝交涉成功，諸葛亮亦未曾忘記對蜀吳聯盟進行維繫和鞏固的工作。他持續遣使至孫吳，以不斷強化盟約的穩定性。諸葛亮所任用的外交人員，繼鄧芝以後的陳震³⁴、費禕³⁵等人，不僅辯才無礙、謹慎持重，更是見識匪淺、深謀遠慮的不凡人物，深得孫權器重。這種作法除了對聯盟關係提供「定期保養」的功能外，尚能在心理層面向孫權暗示蜀漢的人才濟濟，以維持孫吳對蜀漢的平等定位，增強蜀吳共同戰線的合作力量。

2-2-2 蜀漢政經的更新

與東吳的復盟解除了蜀漢迫切的存亡危機，諸葛亮接著所面臨的問題則是如何讓蜀國在僅存的一州之土上，擴充其經濟實力以與魏吳並肩對抗。蜀漢創業前期的功臣名將，大多在劉備駕崩前後相繼逝世，如龐統、法正等謀士，著名的五虎將亦僅剩年邁的趙雲。欲建立一套新的政府體制，諸葛亮自然必須審慎處理人事任用的事宜。

萬繩楠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專文討論「諸葛亮的治實精神」，認為「治實」不僅概括了諸葛亮一生活動的根本，更是治蜀的基本方針。³⁶左思的〈左都賦〉稱當時蜀中「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稊稻莫莫」的豐饒景象，但實際上當時的經濟勢力多掌握於三蜀豪強手中；劉焉、劉璋二人治術平庸，縱容蜀土人士專權自恣。³⁷諸葛亮深感解決此問題的重要性，原因有二：其一自然是解決地方豪強過於跋扈，以免除耕農遭受欺侮進而導致生產停頓、或地方勢力集體反叛的憂患；其二乃因劉備所領導的權力核心集團多為荆楚之人，其與蜀地就有的知識份子、統治階級亦存在矛盾與對立。

諸葛亮強調「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他認為蜀中政治不彰的原因，在於劉璋以來執法不嚴，官員之間相互奉承，於是政策執行缺乏效率、刑罰亦不嚴苛。³⁸諸葛亮結合「威之以法」與「服最輸情」的精神，免除不人道的「連坐」制度，給予犯錯者改過自新的機會(如李嚴)；限之以爵，即所謂「爵不可以無功取」，以這種精神限制權勢之門仕官的機會、革除東漢憑出身世襲封爵的制度，從而任用更多賢人能士。³⁹

諸葛亮大量任用蜀中人士，如秦宓、吳懿、費觀與彭蒙等人，藉此提高蜀人參與決策的機會，以安撫舊有仕族。特別的是，諸葛亮為避免本地集團形成結黨營私的集團勢力，對於自己的繼承者(即繼其後軍政大權的接掌者)，皆自外地人士選拔、培養，如蔣琬、費禕乃至於曹魏降將姜維。不過，諸葛亮對益州就有仕族的重用，比起兩漢時期在政治方面歧視益州

³³ 李奇龍《孫吳政權興亡之研究》，前引書，頁 58

³⁴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董劉馬陳董呂傳〉：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

³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³⁶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昭明出版社，1999年，台北市，頁 56

³⁷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蜀記》

³⁸ 晉·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郭沖五事之一

³⁹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前引書，頁 58

人的一貫態度，確實讓益州居民相當滿意；甚至在諸葛亮北伐期間，益州地主皆積極地供應其糧食、兵員。由此可見，諸葛亮在族群融合方面的政策是成功的；蜀漢憑藉一州之力而能與魏連年作戰，也與其統治集團內部的整體團結有關。⁴⁰

建興二年(西元 224 年)春天，蜀國積極拓展農業生產、關閉隘口與民休息。⁴¹蜀漢係小國寡民，又要維持對北部的軍事防備，諸葛亮為節省勞役，採取軍屯是很合理的策略。蜀漢雖有天府之國的盛名，僅依賴蜀地糧食生產並不足以供給前線將士；加之西蜀地形崎嶇，糧車運輸不便。為避免後勤補給耽誤戰事，諸葛亮在發動北伐前夕，率領軍士至漢中一與曹魏接壤的軍事最前線一就地屯田。⁴²為強化漢中地區的農業發展，蜀漢利用自西東貫的漢水支流，興辦屯田、修建水利工程。或謂蜀漢軍屯時期過短，較之於吳魏顯得成效有限；⁴³馬植杰先生則肯定蜀漢之屯田超越魏國在雍、涼一帶的成就，只緣史書失載而不得為後人所知。但馬先生也承認在作戰前線同時進行屯田工作，於技術方面難度相當高，⁴⁴或許這就是蜀漢軍屯似乎不及魏吳的原因。

商業方面，《太平御覽》中所引《丹陽記》與《蜀都賦》皆有記載蜀漢織錦業相當發達，甚至魏吳境內的織錦都須仰賴蜀漢的出口。蜀漢出產的生薑、蜀錦皆有販於魏境商販，顯示蜀國的出口貿易相當頻繁；蜀吳之間的聯盟貿易更為興盛，自不待言。⁴⁵是推究其因，諸葛亮深知魏之強大，欲以其為敵，僅靠糧食增產和收取稅賦並不足以支應開銷。尤其過分徵收賦稅將會失去民心，糧食作物亦無法長久保存，故唯有與魏吳大量貿易，方是為蜀漢開闢財源的絕佳途徑。

2-2-3 諸葛亮面臨的抉擇與重新規劃

本章第一節已述及蜀吳反目的原因及象徵意涵。簡而言之，荆州的盟友鬪牆、猇亭一戰的兵戎相見，在破壞「蜀吳合作」的基礎下，徹底打亂了《隆中對》的規劃。諸葛亮在劉備死後成為蜀漢政府的權力核心，必須深思的重要課題是：蜀漢是否要繼續依循《隆中對》作為發展的主軸呢？

「與吳復盟」並非難題，前文已解釋蜀吳同盟的必要，諸葛亮需要的只是一位能言善道的外交能手。透過和吳，能給予蜀漢在國防、經濟方面的保護與支柱；透過和吳，能建立貫串長江南岸至四川地區的聯合防線，鞏固蜀吳的半壁江山。但是最重要的抉擇是，蜀漢應該就此放棄興復漢室、偏安一隅；亦或是持續剿魏，以扶正獻帝為己任？當時，劉備時期的遺臣多已年邁，諸葛亮若以「新逢國喪，不宜立即用兵」為由推拖，蜀國或能保持防守態度直至「擁漢派」的力量消散為止。但從諸葛亮對於屯田地點的設置，可以看出其對經營漢中地區的積極態度，當然若解釋為「單純重視漢中的防守」也相當合理。然筆者以為，若諸葛亮欲採純防衛策略，應以劍閣為事宜的守備前線(由後來鍾會入蜀攻擊，姜維的防守戰術可知一二)。在防守態度的先決假設條件下，諸葛亮對於屯田工作的部屬應以劍閣為中心，一方面可確保間隔的補給作業、一方面則減少漢中遭受攻擊時的損失。由諸葛亮實際的舉動，可見他

⁴⁰ 馬植杰《三國史》，前引書，頁 122

⁴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⁴²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引《水經注》〈沔水上〉云趙雲與鄧芝分別在赤崖屯田、戍守，作者考赤崖約位在今陝西留壩縣東北褒水西岸，距離魏境之散官已不遠。前引書，頁 277

⁴³ 王忠孝《諸葛亮政治戰略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147

⁴⁴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前引書，頁 278

⁴⁵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前引書，頁 288

最後依然選擇繼承劉備遺志、繼續抗魏，對於諸葛亮人格個性的分析與對其內心想法的揣測，將留待第五章予以探討。

確立積極的對外態度後，如何修正《隆中對》以符合既成事實是下一個主要課題。筆者並無法從文獻上得知諸葛亮的實際修正方案，所以只能從諸葛亮後來的作為大致推估。由於《隆中對》中的北進策略是橫跨荆益、兩軍並發，在失去江陵控制權的情況下，蜀軍僅剩出秦川一途。諸葛亮透過整合官僚結構、經濟體系的強化，迅速累積蜀漢在夷陵大戰中喪失的國力；重新架設與東吳的聯合陣線，盡力符合《隆中對》中所提及的：「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進而推論，諸葛亮認為蜀漢已不能「待天下有變」，主因人才凋謝太快、諸葛亮本人也即將邁入中年，至此他必須主動創造攻擊時機。

第三節 平定南蠻

益州儘管號稱天府之國，農業、織錦又有鹽鐵之利，單以這些資源作為與魏長期戰爭的軍費是有困難的。當時，南中地區民族拒絕向蜀漢政權納稅服役、地區領袖又時常慫恿居民造反，於蜀漢而言實如芒刺在背。⁴⁶蜀漢後主建興三年(西元 225 年)，諸葛亮決心徹底解除此肉中刺，舉兵南下以掠奪南中物資、補充人員，進而充實蜀漢軍事力量。⁴⁷

2-3-1 平南的過程與結果

與益州接壤的雲南地區，地處中國邊陲地帶，山勢崎嶇、交通不便，當地族群受地形影響而四處分布、部族繁多。三國時期，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兩大族系：一為氐羌族系，一為百越族系。氐羌族系如叟族，按《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為分布於南中地區的青羌，民風剽悍、自董卓以來即時常被漢人軍閥收為士卒。百越族系如僂人，《水經注》〈江水一〉引《地理風俗記》，謂僂人係「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指出僂人漢化程度較深。僂人居住地區以滇池周圍的平坦地帶為主，且擁有灌溉種稻的技術，顯示其並非「未受開化」的原始部落⁴⁸。不過，儘管部分部族與漢族來往頻繁、習慣相近，蜀郡以外的聚落就顯得相對特殊，文化、組織亦與蜀郡內的部族大相逕庭。

蜀漢建興元年叛變的益州郡大姓雍闓先後殺害太守正昂、擒拿新任太守張裔遣送東吳，並接受東吳任命「永昌太守」職銜。雍闓同時拉攏了另一名越西郡王孟獲，於南中境內大肆散播謠言，挑起民族對立，⁴⁹逐漸凝聚成一股反蜀漢勢力，對正處於低潮期的蜀國無疑是一大威脅。起初，由於蜀漢甫受夷陵大戰的慘痛洗禮，短期之內不宜再事兵戎，故諸葛亮並未立即發動討伐，僅「務農植穀，閉關息民」。⁵⁰

經過兩年的休生養息、厲兵秣馬，蜀漢建興三年春天，蜀漢丞相諸葛亮親率大軍南下討撫蠻夷。兵分三路，東路馬忠率軍直指臧荊，於且蘭剿滅朱褒；中路李恢自平夷趨近滇池，一度為南中軍圍困，後用計一舉大破突圍，驅逐敵軍；⁵¹西路諸葛亮軍屯駐卑水，交戰前南中軍團內部發生衝突，雍闓為高定屬下所殺。諸葛亮見機不可失，立即發動攻勢，攻陷越嶲郡、斬殺高定。孟獲整合潰敗的雍闓、高定部屬，繼續抵抗諸葛亮、李恢兩路軍隊組織的聯合攻勢。

孟獲素為南中各部落所臣服，諸葛亮聞之，決心將他收服。「七擒七縱」一事的真實性頻受質疑，此事雖不見於陳壽《三國志》，司馬光《資治通鑑》卻有提及。依據孟獲官至蜀漢御史中丞的歷史事實判斷，七擒七縱或有誇大，卻不見得全然不實。歷經幾場小規模會戰後，南中首領孟獲終於俯首稱臣，蜀軍折返滇池，當年秋天即班師回朝。

南中平定後，諸葛亮將原本的南中四郡分為六郡，設置官府機構、任命太守。⁵²既有統制機關設立，若說蜀漢並未留下一兵一卒，應與事實不符。不過南中六郡太守中，有三位為

⁴⁶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牁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

⁴⁷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上海市，頁88

⁴⁸ 馬植杰《三國史》第二十章〈蜀漢的少數民族〉，前引書，頁346~頁352

⁴⁹ 《華陽國志》〈南中志〉：「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蠅腦三升，斲木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

⁵⁰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⁵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

⁵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

南中人⁵³；且太守以下，「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任用南中當地擁護蜀漢政權的當地人，除了冊封其為當地官員，入朝中者亦有較優渥的政治待遇。⁵⁴

整體而言，諸葛亮依循他在《隆中對》規畫的「南撫夷越」，盡可能採用安撫的方式取代武力鎮壓，相較於東漢時期政府慣用的血腥手段，他有效改變了激化民族矛盾的強硬作風，以利益柔性誘導南人服漢。曾有人向諸葛亮表達對於重南人的疑慮，他的答覆則再次體現了其「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的思想。⁵⁵

2-3-2 平南的意義對北伐的貢獻

南中的平定，象徵著蜀漢政府對南中地區上層階級的拉攏；而此舉的目的，其實不外乎是透過南中上層份子，以調動南中人民為蜀漢政權效勞。⁵⁶蜀國主要向南中徵收耕牛、犀牛、戰馬、金銀等物資，以應付國防軍事的龐大支出，且根據既有文獻判斷，蜀國徵收的資源量應相當龐大。⁵⁷南中藏有豐富鹽礦資源，諸葛亮遂徵收原本為大姓、酋帥所占據的鹽井礦山，遣官員管理、發展煮鹽與冶鐵；向南則輸送蜀棉並傳授織錦技藝。此外，諸葛亮拔擢了叟族驍勇善戰的青年，組成一支「無當飛軍」，交由牙門將王平統帥；將較羸弱的夷人編於大戶部曲，作為佃農以促進生產⁵⁸；對於剛強兇狠的「惡夷」，則鼓勵大姓富豪出資聘為家部曲。簡而言之，諸葛亮將中原地區封建制度的隸屬關係帶入南中，改變益州土著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相互關係，藉以加強對於國境人民的掌控、充分採集資源。⁵⁹

大體而言，諸葛亮對南中的治理政策確保了南中上層階級的利益、增進漢夷之間的文化交流，於此貢獻良多；另一方面，由「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又可見蜀漢政權帶來的經濟壓力、對於少數民族勞動者的剝削與壓迫。⁶⁰周一良先生於〈論諸葛亮〉一文中，表示諸葛亮的種種政策「實為了欲滿足漢族及非漢族地主們的要求」，忽略了南中地區人民生活的壓力。不過，周先生也承認比起後漢時代的官吏，諸葛亮的政策相較之下確實緩和得多。⁶¹其主要原因，係諸葛亮所建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清明政治風氣，能夠有效遏止官吏假公濟私、從中得利的弊端，人民的負擔自然也減輕許多。

另外，諸葛亮提倡牛耕、推廣漢人耕作技術，許多夷人漸出山林、居平地、築城邑並務農桑，加速了生產效率，也帶動南中人民與漢民族的交流、融合；雲南保山市至今猶有三個諸葛堰與諸葛營，可見其大力推展生產影響之深遠。⁶²

當然，吾人也必須了解，「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⁶³並不是事實。《三國志》即有記載李恢奉命討伐再度反叛的夷人⁶⁴，其他章節亦有相關事跡的記述。不過大致可以推測，自蜀軍大舉南下、收服孟獲之後，南人叛亂的事件雖然未曾停止，但規模較小、影響不大，可見蜀

⁵³ 分別是：建寧太守李恢、雲南太守呂凱、永昌太守王伉。見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前引書，頁 89

⁵⁴ 如建寧爨習官至領軍將軍、孟獲官至御史中丞、朱提孟琰官至虎步監。

⁵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

⁵⁶ 馬植杰《三國史》，前引書，頁 128

⁵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

⁵⁸ 《華陽國志》〈南中志〉

⁵⁹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前引書，頁 90

⁶⁰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前引書，頁 92

⁶¹ 周一良〈論諸葛亮〉，前引書，頁 12~頁 13

⁶² 宗樹敏《諸葛亮治蜀之研究》，前引書，頁 115

⁶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引《襄陽記》

⁶⁴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

漢政府對於南中地區的治理確實有所收穫，成功抑止大範圍集體抗拒統治事件的發生。有關於此，筆者認為應與蜀漢對於南中的持續經營有關。代表蜀漢前往管理南中的官吏中，行政能力出眾者繁多，且更可貴的是其中不乏頗得民心者。如馬忠為人寬宏大量、行事果斷，恩威並立而頗受夷民景仰，且能融入當地居民生活圈；⁶⁵張嶷奉旨自巴郡回成都時，更有數百夷民追隨其右、入朝進貢。⁶⁶兩人去世後，夷民猶位其立廟參拜，足以顯示當地居民與官吏間的感念情誼。

除了獲得豐富的資源補給、兵員供應外，平定南中對於蜀漢而言的最大助益仍是解除了其後顧之憂。至此，諸葛亮已確實完成「外結好孫權」、「南撫夷越」兩步驟，在策略執行上又向《隆中對》靠近一大步。藉由鞏固西南地區的政治局勢，擴大蜀漢的統治範圍、充實國內的經濟實力；此次對南中的用兵，亦可視為一種軍事操演，以間接籌備未來對曹魏的北伐作戰。收納南中後，蜀漢境內的政經結構漸趨整合，逐漸具有向外擴張的國力。

⁶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侯。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嘲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并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

⁶⁶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李呂馬王張傳〉：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國人也。...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縑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第四節 小結

蜀吳聯盟大致底定了三國時期南北對立的基本架構，也確立了南方共同作戰陣線的整體組織。儘管此聯盟在權力結構理論上，是屬於自然形成的同盟關係，內部不斷變動的相對勢力均衡卻牽動著整個合作系統的穩定性。無法排解的荊州歸屬問題、聯盟內部逐漸失衡的均勢力量、蜀吳雙方領導者的認知差異，種種原因逐漸累積，終於推翻了原有的同盟理論與組織，再次挑起三國局勢的巨大變動。久經沙場的劉備親率遠征軍，聲勢浩大地興師問罪，遇上足智多謀的出生之犢陸遜，最終蜀軍因戰線過於延長、軍隊調動不當等種種差錯，被吳軍予以痛擊，蜀軍將領折損殆盡，劉備也因此一病不起。

隨著荊州的失去、猇亭之役的慘敗，蜀漢由一個蒸蒸日上的新興政權頓時瀕臨覆滅邊緣。執掌國家大政的諸葛亮面對愕然的劇變，以其全面深思遠慮的籌劃功力，為搖搖欲墜的蜀漢找到重新出發的方向；以剛正不阿、確實嚴謹的態度，為內憂外患的蜀漢打造一個效率極高且清廉透明的行政團隊；以全面而細膩的手法，再次將蜀漢脫軌的經濟系統拉回正道，終於使一度危急的政權，在國喪與外敵的強風大雨中屹立不搖。

儘管情況有異，諸葛亮毅然選擇繼續依循隆中路線。遣使與吳言和，打破魏吳同盟關係以確保蜀漢的實際國防安全，將天下局勢重新導引回到南北對峙的局面；為求強化蜀漢大本營的安全、以及應付龐大的軍事支出，諸葛亮在詳細規劃、判斷情況之後，於蜀漢建興三年舉兵南下，一舉平定叛亂的郡守、收服拒絕服從統治的酋長，並藉由南中平定戰役拉攏南中上層階級份子，以透過這些擁護的南中人士將蜀漢的統治觸角延伸至蠻夷部落，並榨取資源、吸收人力，以為國家所用。

諸葛亮在劉備去世，直到建興五年發動首次北伐的短暫期間，展現了其驚人且高超的領導與規劃能力。他不僅帶領蜀國度過風聲鶴唳的艱苦難關，更讓蜀中地區在短短五年內將其經濟能力大肆發揮。諸葛亮不忘劉備遺旨，始終以討伐曹魏為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他深刻了解蜀漢孱弱，與曹魏公然為敵必然有所障礙與困難。因此諸葛亮從各個角度，思考足以如何為蜀漢提供足與曹魏一爭天下的實力，於是他著手內政改革、強調安撫少數民族、堅持與東吳維持同一陣線，目的無非希望能夠集結天下之反曹勢力，最終達到「興復漢室」的目標。

在蜀漢的種種政績與制度下，吾人確實看到許多弊病與不妥之處，也體會到諸葛亮面對一個即將覆滅又急欲擴張的國家，其心中的衝突與焦慮。然而從諸葛亮的所作所為、對於現實國情的影響，諸葛亮無疑是相當成功的。他的行政設計結合了前朝遺留下的經驗、他自身的觀察與對事實的分析解讀，以「治實」的精神處理蜀中大大小小的事務，更有效率地根絕、革除許多氾濫已久的行政弊病。當吾人在歷史記載中，看到已露敗像的蜀漢竟在短短五年內成長茁壯、突飛猛進，就不得不佩服諸葛亮，他的睿智與眼見，實堪稱古今奇才。

第三章 諸葛亮的北伐

第一節 第一次北伐

蜀漢建興五年(西元 226 年)，諸葛亮北伐的籌備計劃進入最後階段。經過四餘年的休生養息、養精蓄銳，蜀漢政經氣象一新、國勢亦漸趨穩定。陳到進駐永安、李嚴於江州築城以爲後應，共同防範孫吳⁶⁷；諸葛亮則親率各路軍隊，移屯漢中，臨行前作《前出師表》以上疏劉禪，勸諫這位年輕的主君親賢遠奸、察納忠諫。⁶⁸翌年，諸葛亮對曹魏發動第一次北伐，自此揭開蜀漢政權的嶄新的一頁。

3-1-1 第一次北伐的戰術方針與規劃

第一次北伐明顯攸關著蜀國未來的興衰發展，身爲本次行動策劃者的諸葛亮自然也必須詳加考慮各種策略的可行性與隱藏風險。蜀漢自喪失荊州主權後，兩路夾擊曹魏的策略基礎也不復存在。欲以區區一州之軍一舉針對關中地區發動直接攻堅，不但有遭受敵軍迂迴合圍的危險，更可能面臨補給線被截斷的窘境。故，首次北伐的路線、戰略方針的擬定，無疑是決定本次戰役的勝負關鍵。

漢中夾在關中與四川之間，倚恃大巴山與秦嶺，擁有天然的防禦屏障。由於此地山勢其區，許多關口也因而成爲足以扼阻四方交通的咽喉地帶，故每一寸領土的得失，都足以對整體戰局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由漢中通往關中地區，由西而東共有三條道路，分別爲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其中以子午道雖然險峻，卻可出其不意地突襲長安；儻駱道谷長僅 420 里爲三道最短者，但山路曲折迴旋、行軍不易；褒斜道延褒水、斜水河谷而行，秦漢以來屢修棧道，向來爲關中與巴蜀地區的重要通道。⁶⁹按《魏略》所言，諸葛亮認爲軍從坦道較爲安全無虞，故選擇褒斜道作爲行軍途徑。

由於直接攻擊關中的風險太高，出兵隴右顯得相對實際。一方面可掠取糧食量產的地區優勢、進而與曹魏進行持久戰；另一方面又因隴西高原的地形受六盤山、隴山、秦嶺等處屏障，無疑爲蜀軍提供天然的掩護。⁷⁰考慮《隆中對》戰略因荊州喪失而產生的不利，隴右地區顯然成爲進軍關中的另一契機，故諸葛亮逐漸將其北伐戰略設定爲「蠶食雍、涼，廣拓境土，徐圖中原」的策略主軸。⁷¹

不過，若說諸葛亮未曾考慮直襲關中的策略，恐怕也不完全正確。先人經驗猶未遠，漢高祖劉邦即是由漢中出秦川奪取關中。從諸葛亮在北伐前暗中連絡上庸守將孟達的舉動判斷，他應亦曾將東出關中的策略納入考量。由於關中與漢中之間的道路爲豫鄂山地所阻，補給運輸不易，如能佔據上庸，則可作爲後勤輜重的中繼站，確保位於關中的前線部隊糧草供給無虞。蜀漢失去荊州後，孟達因未出兵支援關羽、恐受責備，又與劉封不和，於是投靠曹魏，頗受曹丕重用，受封爲新城太守，統轄房陵、上庸與西城三郡。然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與孟達頗爲投緣的桓階、夏侯尚相繼去世，孟達在曹魏政壇中漸感孤立不安，是故當諸葛亮

⁶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⁶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⁶⁹ 饒勝文《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北京市，頁 237~238

⁷⁰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85

⁷¹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334

主動與來函時⁷²，孟達很快就決定響應蜀軍北伐。可惜孟達素與魏興太守申儀不睦，計劃為其所洩漏。而孟達亦未能隨機應變，自料司馬懿如欲發兵來犯也需要耗時數日文書請示曹叡，豈知司馬懿以急行軍的方式迅速抵達上庸，新城陷落而孟達亦被斬首。至此蜀軍欲以上庸為策應的兩面戰術宣告失敗，聞知孟達起事失敗後，諸葛亮並未稍加猶豫，立刻放棄這項間接攻擊計畫、著手部署他已經設定好的北伐戰略：以奪取隴右為首要目標。

3-1-2 第一次北伐的實際情況

蜀漢建興六年(西元 228 年)，諸葛亮遣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艾由褒斜道揚聲攻取郿縣，軍士聚集在箕谷以為疑兵；⁷³諸葛亮親率主力部隊出祁山，軍容壯盛、聲勢浩大，南安、天水及安定三郡紛紛叛魏應亮。蜀漢驟然的軍事行動引起曹魏境內一片震驚，⁷⁴魏主曹叡連忙召集滿朝文武商討對策。散騎長侍孫資提出承襲一貫對吳蜀的戰略：鑒於吳蜀雙方各據易守難攻地形，故因採取兩面防守策略，分派大將陣守防禦要地，待敵軍糧盡退兵。⁷⁵曹叡採納此言，遣大將軍曹真督關右諸軍，屯駐斜谷北口郿縣以待趙雲軍團來犯；老將張郃更親率五萬步騎趕赴西線支援。

起初魏軍為趙雲疑兵之計所迷惑，諸葛亮因而有機可乘，一舉降服涼州三郡。蜀軍至此看似成功，然涼州三郡易得復亦失，一旦魏軍反撲成功則所有情況又將重新改觀。蜀魏雙方都深明這點，曹真當機立斷，一方面親自督戰、加強對於趙雲軍團的壓迫；另一方面遣張郃領軍增援隴右，對蜀漢展開兩面反擊。蜀軍的因應策略則為兵分三路，嚴守自關中通往隴右的三條通道，一旦其中任何一路發現張郃部隊，其餘二路立即趕往支援。張郃軍團的到來，之於北伐攻防整體是一大關鍵：若能擊潰魏軍，即便魏明帝要發動第二批討伐軍，諸葛亮軍團也能在敵軍行動前往長安方向壓制，並與趙雲、鄧芝等人會師，對長安構成威脅；然而若被魏軍擊退，除了導致蜀軍主力無所依據，深入涼州的魏延等部隊也有被切斷連繫的危險。換言之，這場戰役將成為決定蜀魏雙方在涼州地區勢力消長的關鍵，也是北伐行動能否繼續進行的決定性因素。

當時諸葛亮獨排眾議，任命新銳將領馬謖為先鋒統帥，領軍扼守街亭。馬謖係馬良之弟，馬良擔任劉備侍中，頗受器重，馬謖也因此有機會接觸蜀漢的權力核心。由於馬謖才智卓越且好論軍計，諸葛亮相當器重他，兩人常通宵暢談，由此亦可推測他對於兵法與治國之道必有獨樹一格的見解。儘管劉備臨終前曾語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諸葛亮還是對馬謖抱持極大的信任與期盼。⁷⁶

豈料馬謖竟拒絕遵循諸葛亮的調度，放棄守備列柳城、捨水上山，不理會參軍王平屢次苦勸。張郃軍至，包圍馬謖、斷其水源，蜀軍飢渴難耐、士氣渙散，加上敵眾我寡，很快就分崩離析、士卒四處逃竄，馬謖也歷經一番血戰才勉強突圍而出。王平見馬謖潰敗，率一千餘人擊鼓吶喊、震懾魏軍，張郃懷疑有所計謀而不敢追擊，蜀軍方能收拾殘軍、撤返主營。⁷⁷

街亭的失守，不僅導致蜀軍不僅無力守住通往隴右地區的防線，兩側戰線更陷入崩潰危

⁷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言〈與孟達書〉收錄於《諸葛氏集》

⁷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⁷⁴ 《魏略》：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⁷⁵ 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前引書，頁 94

⁷⁶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董劉馬陳董呂傳〉

⁷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黃呂李馬王張傳〉

機。已深入涼州地區的魏延，為避免與主力軍團失去聯繫，立刻率軍返回益州，原本響應蜀漢的涼州三郡則一一被魏軍平定。東線地區戰況艱難，蜀軍收攏兵馬、固守陣地，將軍隊折損壓至最低⁷⁸；趙雲更親自斷後，使軍隊物資皆能返抵漢中。⁷⁹第一次北伐行動也在蜀軍各路退回蜀境的情況下，宣告結束。

3-1-3 第一次北伐的意義

平心而論，諸葛亮所引導的數次北伐行動中，以第一次最有成功的契機。蜀國自猇亭之役後便未曾與魏吳發生軍事接觸，因此當蜀軍忽然向關中、隴右同時發動突襲時，魏國的反應完全是陷入措手不及的徬徨；諸葛亮擬定的疑兵戰術，在設計與執行兩方面都相當成功，可謂完成一次以「欺敵」和「奇襲」為主軸的攻擊行動⁸⁰；涼州三郡也在此時一齊叛魏降蜀，對蜀軍而言更是如虎添翼。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共同創造了一個絕佳的獲勝機會，蜀漢北伐攻略即將取得第一個值得慶賀的重大勝利。

導致戰局急轉直下的關鍵，自然是馬謖的街亭之失。以諸葛亮縝密的思考習慣，應該不可能遺漏馬謖缺乏經驗的弱點，卻在馬謖第一次出陣就命其為先鋒主帥，原因何在？馬謖任參軍，隨諸葛亮出入已久，想必也受到許多諸葛亮的指導與教誨，因此諸葛亮對於馬謖的天份與資質充滿十足的信心。筆者推測，期待將馬謖提拔為能夠分擔責任的領袖，首要條件就是馬謖必須擁有相當的地位與名分。街亭一役就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如能重挫魏軍，攻陷長安便指日可待，而馬謖則成為整次行動的關鍵功臣。也許因為上述兩項因素，使諸葛亮決定派遣初出茅廬的馬謖擔起先鋒總帥的重責大任。至於擅自決定在南山駐紮，馬謖突然更改諸葛亮的策略之理由，史料上並無記載。依循前面的假設，筆者認為馬謖或許也體認到諸葛亮對自己的器重，因此急於建立功名以證明自己的才華。故若能採取不同於諸葛亮的策略而取得勝利，對於馬謖的聲望、地位無疑是一大助益。

戰事告終，諸葛亮誅殺馬謖、張休與李盛，奪黃襲兵權，諸葛亮、趙雲等人應政治責任貶職數等。關於是否應斬馬謖，頗具爭議⁸¹。馬謖罪及死刑，依軍法應斬首示眾。面對常侍於左右的愛徒，不難想像諸葛亮心中的掙扎和痛苦。其實以丞相的身分，用各種理由減輕馬謖的罪行、免其一死，諸葛亮並非辦不到；但他終究選擇謹守法度，依法處死馬謖。《孫子兵法》於〈始計篇〉就提到「法令執行」乃「知勝負」的關鍵之一，軍令的貫徹執行維繫著軍隊紀律的正常運作。尤其諸葛亮身為北伐行動的總指揮，更得擔當起以身作則的義務。不過，諸葛亮決定依法斬馬謖尚有另一原因。當初是諸葛亮破格任用馬謖為前軍統帥，因此街亭之失他也難辭其咎。若不斬馬謖，全軍將士私下難免竊以為不平。因此，斬馬謖除了作為「嚴守軍法」的行陣風氣、塑造諸葛亮「鐵面無私」的軍中權威外，也是為諸葛亮尋求一個謝罪的管道，藉此延續他對於蜀漢軍團的統領正當性。綜合以上幾個觀點，斬馬謖顯然是別無他法的決定，而諸葛亮也在縝密的思考過後，含淚將馬謖送上刑場。

本次行動，蜀漢的兩項收穫是徙西縣人戶千餘家，並收降魏天水郡參軍姜維。儘管功敗垂成，諸葛亮並不氣餒。積極籌劃、伺機發動下一次的北伐。

⁷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關張趙馬黃傳〉

⁷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關張趙馬黃傳〉引《趙雲別傳》

⁸⁰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85

⁸¹ 晉·陳壽《三國志》〈董劉馬陳董呂傳〉引《襄陽記》：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幹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第二節 第二、三次北伐

蜀漢建興六年秋，魏大司馬曹休爲吳將周魴詐降所欺，於石亭遭逢東吳陸遜所引領的三路軍隊夾擊、大敗而歸。曹魏自關中抽調部隊前往東線戰場支援，諸葛亮認爲「魏兵東下，關中虛弱」，遂獻《後出師表》予後主劉禪，發動第二次北伐。⁸²

3-2-1 第二、三次北伐的目標與限制

嚴格來說，第二次北伐是一次未經過周延策畫、略嫌倉卒的出征。⁸³這次攻擊行動的目標爲陳倉縣，依既有文獻推測，諸葛亮本次行動的主要目的應是爲未來的北伐提供不同的進軍路線；對於陳倉的攻擊，亦能減輕曹魏對於東吳的壓力，達到蜀吳聯盟兩面牽治的效果。豈料曹真先一步預測諸葛亮的意圖，推斷蜀軍首次失利於祁山，必以陳倉爲下次攻擊的重點目標，故先遣郝昭、王生等人守之。諸葛亮兵至陳倉城下，遣郝昭同鄉人前往勸降，不得，始與之戰。⁸⁴

諸葛亮挾人數優勢、審度魏之援軍不能立即趕到，於是發動攻城。孰知郝昭也非泛泛之輩，諸葛亮先後運用了雲梯、衝車和井闌等攻城武器，試圖突破陳倉城的防禦工事，卻被郝昭以火箭、落石和內牆等方式化解，郝昭甚至橫挖溝渠破解蜀軍的地道突襲。雙方激戰了二十餘日，猶未見勝負。⁸⁵時魏將費耀已率軍抵達，位於河南的張郃亦奉命準備發兵⁸⁶，諸葛亮遂以糧草耗盡而退兵。魏將王雙率騎兵欲追擊蜀軍，爲諸葛亮部屬所斬。

區區一座陳倉城，諸葛亮以數萬之眾竟不能克。若非王雙躁進追擊蜀軍而遭斬殺，蜀軍這一次的進攻計畫可說是完全地徒勞無功。此事也彰顯了蜀軍的困境，亦即在北伐戰線上的狹隘。受制於崎嶇的地形，諸葛亮的行軍策略不僅爲曹真所料，實際作戰時也未能發揮兵力上的優勢；郝昭又善於防術，於是智若諸葛亮猶無可奈何。此戰中，曹真精準地掌握住蜀軍因天然條件而形成的障礙與限制，成功抵禦諸葛亮地進犯。

蜀漢建興七年(西元 229 年)春天，諸葛亮第三次出師，遣陳式攻取武都、陰平二郡。此二郡的位置正好擋在益州通往漢中的大道之側⁸⁷，諸葛亮爲求漢中、益州兩地之間的暢通無阻，以維繫其北伐的前線攻勢，故遣軍力圖奪取兩地。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軍欲前往迎擊陳式，聞諸葛亮親率主力軍攻至建威，郭淮即退走。⁸⁸試論其因，郭淮見諸葛亮軍團前來，兩軍交戰勢必曠日費時，屆時武都、陰平二郡亦不可救，郭淮本軍猶有遭到蜀漢兩軍夾擊的危險。西元 219 年，曹操退出漢中前夕曾將此地居民五萬餘人遷徙至扶風、天水邊界，或許證明曹操早已預知此二地之不可守。⁸⁹

⁸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

⁸³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338

⁸⁴ 《魏略》：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

⁸⁵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魏明帝太和二年

⁸⁶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張樂于張徐傳〉：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⁸⁷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魏明帝太和二年

⁸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⁸⁹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338

武都、陰平的取得或能視為蜀軍的小型勝利，然此二地僅能將蜀軍在北伐前線的陣地形式建構得更加完備，卻不能解決蜀漢進軍路線受限的問題。第三次北伐從結果的角度而言是成功的，但是這次進取的成果對於北伐的整體貢獻仍是相當有限的。有鑑於第二次北伐目標、路線竟為曹真所預料，如何重新擬定一套足以再次撼動曹魏的作戰模式，是身為北伐決策者的諸葛亮不得不慎重思考的議題。

3-2-2 三次北伐帶來的戰略思維轉變

承繼第一次北伐的奇襲攻擊，諸葛亮在執行第二、三次北伐時仍試圖以突擊的方式使魏軍手足失措，然而其效果相較於第一次，顯然落差甚遠；戰術運用上，第二、三次直接搶攻的方式也不比第一次北伐細膩的疑兵策略，或多或少也表現出蜀軍情勢的艱困。前文已述及，蜀軍的戰術方針逐漸為魏將所掌握，曹真等人也逐漸適應諸葛亮的進攻節奏。北伐發展至此，面臨一項相當重大的轉變，亦即「奇襲戰」思維的結束與「持久戰」概念的開始。

所謂奇襲戰術，為求達到「攻人之不備者」的效果，講求迅速而猛烈的攻勢，其戰術型態也較趨積極擴張。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所率領的主力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曹真識破疑兵戰術前大舉深入隴右地區，拓植據點以待敵軍的反撲。這種進軍方式或能在短時間內收到豐碩的成果，然而其風險也相對較大。如同街亭之役徹底摧毀第一次北伐的既有收穫，短期內取得的領土，其不穩定性和變動率是相當大的。再者，一旦迅速擴張的收穫為敵軍所奪回，則進軍期間消耗的大量補給、資源將無法回收，對於國勢較弱的蜀漢而言，過於沉重的開銷會快速拖垮蜀地的經濟，甚至危及蜀國的立國根基。

相較於奇襲戰，持久戰就顯得保守而穩重。這種戰術注重的是戰時的資源供應、物資補給，透過長期的對抗以扭轉不利的局勢。這或許與《孫子兵法》中強調的「兵貴速不貴久」有所矛盾，然而蜀國所面臨的情形卻使諸葛亮不得不採取此策略。「堅守以待敵退」長久以來皆為曹魏同時對抗蜀吳時所採取的方略，蜀漢在面臨這種敵人時若一味採取強硬攻堅，一旦軍士疲憊則將為敵所乘。與敵軍僵持於戰場上，透過各種計謀的運用、情報的調查，尋找敵軍的破綻予以痛擊、或故意製造敵軍錯誤的判斷，都是在持久戰中取得勝利的方法。諸葛亮所引導的最後兩次北伐，在戰略性質上正逐漸向持久戰靠攏。

第一次北伐前，諸葛亮便已在漢中進行屯田工作，或許表示他已將持久戰納入未來戰事可能演變的假想情況。如何在長期的戰爭中，維持軍隊和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轉，正考驗著領導者的睿智；對於諸葛亮而言，北伐的路程無疑是更加艱辛了。

第三節 曹魏的南征

經歷了三次或大或小的會戰，曹魏與蜀漢的邊境勢力依舊維持與戰前幾乎相同的關係。魏明帝太和四年(西元 230 年)，大將軍曹真由前線返回洛陽朝見魏明帝曹叡，加封為大司馬；而後曹真上表，認為蜀漢多次進犯、因予以反擊，以收反客為主之效。⁹⁰由此不難看出曹真在受封後試圖建立功勳的心理，明帝的准奏更體現曹魏對蜀軍事戰略的轉變：由被動防禦轉為主動出擊，此與第一次北伐時朝中所決議的防守方針並不一致⁹¹。

3-3-1 曹魏的攻略計劃與蜀漢的防禦

曹魏太和四年七月，魏明帝曹叡下詔、命令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懿等人對蜀漢發動軍事攻擊。⁹²許多朝臣皆奏表反對北伐，博平侯華歆便上疏曹叡，認為當前應以全力治國為首要目標，且本次出征用兵距離過於遙遠、難以取勝；龐大繁雜的運糧事務又會影響農民耕種之時，將撼動立國基本。⁹³曹叡則認為蜀漢憑恃山川之利、又與東吳建立聯盟，自然不會輕易為魏軍所滅；然而若不主動攻擊、試探，蜀軍也不會自然衰敗，所以在征討中觀察其中間隙，將有助於提高魏軍對於蜀軍的了解。⁹⁴

曹真原擬自斜谷發兵，司空陳群認為斜谷地形崎嶇，糧食運輸不便、又容易受到敵軍抄截；並舉曹操征討張魯時所面臨的困境為其論據。⁹⁵於是曹真更改計畫，率主力軍從子午谷南下，同時遣司馬懿沿漢水而上、郭淮等人則從斜谷、武威一帶發動夾擊。⁹⁶

曹魏的反擊行動顯然也在諸葛亮的假想情勢演變之內。蜀軍在數次北伐的同時，亦並未減緩對漢中防禦的鞏固動作。蜀軍奪下武都、陰平後，諸葛亮立即將指揮總部遷往終南山下的平原，動用軍士建築漢、樂二城。此二城不僅有效強化益州的對外防禦工事，亦能護衛北伐軍的集體安全。探知曹真的南下行動後，諸葛亮命令驃騎將軍李嚴率兩萬軍馬、自江州移防漢中，藉以鞏固前線軍力；另一方面，遣都亭侯魏延領軍進入羌中，迎擊郭淮、費曜的包抄攻擊。⁹⁷

曹魏大軍浩浩蕩蕩、蜀軍則嚴陣以待，雙方戰事一觸即發。孰知，就在此戰前之際，時值九月的子午谷地區竟下起了連日豪雨，雨勢長達三十天都未曾中斷。曹真進軍受阻，「棧道斷絕」⁹⁸、道路峻滑，漢水水位暴漲，行軍速度因而大為減緩。部隊未及與戰便逢此挫折，士氣低落。魏國少府楊阜向魏明帝上疏，以「天屢降變」認為此次征蜀有違天命、軍隊在高山險阻中延滯甚久將大量耗費資財為由，奏請退兵。⁹⁹曹叡於是下詔，令曹真等人班師回朝。由斜谷進軍的郭淮諸軍則遭遇魏延的阻擊，雙方交戰後魏延大破郭淮，魏軍大敗而走。至此，這場雷大雨小的曹魏反撲行動，正式告一段落。

⁹⁰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

⁹¹ 見本研究第三章第一節 3-1-2 頁 17

⁹²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⁹³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

⁹⁴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⁹⁵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桓二陳徐衛盧傳〉

⁹⁶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

⁹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彭廖李劉魏楊〉

⁹⁸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

⁹⁹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辛毗楊阜高堂隆傳〉

3-3-2 子午谷的未解爭議

早在諸葛亮第一次發動北伐時，魏延向諸葛亮自薦，自願帶領五千精兵、五千輜重部隊出子午谷突襲長安。¹⁰⁰前章已討論過子午谷的形勢，儘管險峻但確實能達到突襲之效，因此魏延的戰略亦有其可行性。西元前 206 年，韓信率領漢軍自益州進軍中原時，便曾以奇兵突入河南、掩護主力部隊，跨越關中敵軍直擊潼關、漢軍主力則順利開進中原地區。許多學者批評諸葛亮過於謹慎、不敢弄險，也因此白白錯失了取得北伐勝利的大好機會。筆者認為，以單一角度檢視此事、批評諸葛亮，實有失公允。

學者張大可先生認為，魏延的策略是針對「曹魏都洛陽」的形勢所設計的靈活戰術，不失為上策；諸葛亮背道而馳，虛張聲勢欲奪郿縣而將兵力集中奪取隴右，縱然馬謖不失街亭，魏軍諸軍攻隴則蜀軍必敗。¹⁰¹第一次北伐時，諸葛亮遣趙雲、鄧芝率疑兵出褒斜谷，的確扮演著「欺敵」的角色；然而吾人是以後人的觀點論之，當其時，曹真怎麼可能確定趙雲等軍只是一群虛有其表的中空部隊？即便曹真心中有所猜測，軍機大事又怎可弄險？受制於趙雲軍團，魏軍自不敢輕舉妄動，遑論「諸軍攻隴」；另外，張大可先生以「隴右三郡叛魏」、主張魏延之計可行之說，同樣包含上述的爭議性，此不復贅述。

筆者認為，魏延之計乍看之下確實有攻其不備之功，然其隱含的變數、風險甚大，一旦策略失敗或操作手段失當，甚至可能造成北伐軍的整體挫敗、乃至毀滅。首先，魏延的戰略基礎構築於「夏侯楙棄城逃亡」的假設之上，如果事情不如其所料、夏侯楙堅守不出，魏延以五千軍力，安能輕易攻下曾為西漢首都的長安城？再者，子午谷山勢險峻，如果魏延軍遭逢突發狀況，其撤退路線不僅有被截斷之虞，崎嶇的山路更將大幅增加遭受追擊的風險。且縱然魏延的奇兵奏效、順利進駐長安，諸葛亮的主力軍是否能在短期內迅速推進至長安、與魏延會師？倘若蜀軍主力受到阻礙甚至陷入膠著戰，魏延的奇兵將瞬間成為「孤軍」，曹魏大舉攻來、何以抵擋？屆時不僅喪失足以獨當一面的大將魏延，更將驚醒曹魏的防備，無形中增添諸葛亮北伐的困難。

曹魏此次的反撲，無疑為「子午谷襲擊」做了一次反證。一場突來的大雨能打亂曹軍的行進，自然也能干擾蜀軍的後勤與增援。魏延攻陷長安的計劃或許可行，但考慮奪得城池後所面臨「如何持續防守、立足長安」的問題，這個戰術所引發的後續影響就顯得相當危險。魏延若身陷險境，諸葛亮則必須選擇放棄魏延、或遣軍赴長安援救之，無論哪一種選擇，對於蜀軍的佈署都是一大傷害，也為敵軍製造趁虛而入的機會。綜合以上諸點，筆者認為諸葛亮在這一次的策略決議中，作出了相當謹慎且周延的決斷。

當然，諸葛亮五次北伐卻無功而返的沮喪結果，讓許多人忍不住提出「或許魏延能成功」的假設。的確，魏延的奇襲戰術有可能全盤成功，且蜀軍亦可由此開啓通往中原地區的大門、曹魏的防線也形同崩潰。諸葛亮避開潛在風險、選擇穩紮穩打的道路，正如同他的審慎作風。儘管因為這樣的嚴謹態度，讓蜀軍錯過了一舉成功的大好機會；然而卻也是這種態度，讓蜀漢能以一州之力與魏抗衡。凡事皆為一體兩面，筆者認為在謀事決斷上，諸葛亮是明智的。

¹⁰⁰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楊傳〉引《魏略》：「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宇群下計議，(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¹⁰¹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341

第四節 第四次北伐

曹魏的西征行動無功而返，對於蜀漢無疑是一大鼓舞。¹⁰²諸葛亮趁此時機，持續籌劃進軍準備。蜀漢建興九年(西元 231 年)春天，距離曹真退兵僅半年的時間，諸葛亮再次率領北伐軍出攻祁山，是為第四次北伐。

3-4-1 持久戰的開始

前文已述及，諸葛亮對於由奇襲戰轉為持久戰的趨勢已有所體認；另一方面，曹真的徒勞無功也讓魏軍決策集團再次確認「以拖待變」的重要性。換句話說，持久戰其實已經形成蜀魏雙方的作戰默契，其無可避免地將成為第四次北伐的主軸。

由於曹真重病纏身，魏明帝曹叡改派遣司馬懿為魏軍主帥，督軍前往祁山。曹叡下予司馬懿的詔書中，明確強調「堅守以挫蜀軍鋒利，退卻以消耗蜀軍食糧，待蜀軍撤退再追之。」的戰略方針。¹⁰³歷經三次蜀軍進犯的經驗，魏軍已清楚了解隴右地區的戰略價值。依循堅守原則，由雍涼軍事都督進駐關中做為指揮中心，祁山防線伺機分割敵軍、天水地區的駐守部隊嚴陣以待，加之三輔軍、京畿主力軍團的虎視眈眈，迫使蜀軍無法在魏境進行長久纏鬥。透過這種壓迫式的「攻擊性防禦」，不僅將魏蜀對決強制轉化為持久戰，更使蜀軍在對戰的過程中增加不少困難。

面對魏軍的強勢戰術，諸葛亮設定了「防禦性攻擊」的野戰準則，要求全軍隨時倚恃有利地形與敵人對抗；並擬定後發先制的行軍原則，待曹魏軍氣勢衰竭時發動反擊。鑒於曹魏軍隊人勢眾多、騎兵剽悍善戰，諸葛亮發明了「一弩十箭」的損益連弩以彌補蜀軍的弱勢。¹⁰⁴損益連弩與諸葛亮研發的八陣圖戰鬥序列相互結合，成為蜀軍的新型戰鬥模式。以八陣圖掌握有效地形、構築陣地，待敵先攻；魏軍進犯時，第一線的重步兵以蹲姿舉矛防衛、掩護並發揚後發弩手的火力優勢，直至敵軍出現疲態、士氣潰散時，重步兵隊方展開追擊與近距離交戰。¹⁰⁵

曹魏的「攻擊性防禦」與蜀漢的「防禦性攻擊」，兩相結合，自然成為典型的持久戰—緊繃而錯綜的交戰局面。一旦進入持久戰，決勝的關鍵就在於雙方誰先露出破綻。魏軍固守據點、待敵之失；蜀軍則不斷嘗試攻擊、尋求空隙以見縫插針，同時又須兼顧後勤補給、維持前線防守的完整性。綜合論之，這種作戰形式對於蜀漢而言是相對吃力的。

3-4-2 諸葛亮與司馬懿

諸葛亮發動第四次北伐的前一年，司馬懿方由驃騎將軍轉任大將軍。原駐紮在荊州地區防備東吳，接替曹真的職位負責督領西線軍團。史書載司馬懿有狼顧之相，說明他確實不是泛泛之輩。¹⁰⁶司馬懿精於指揮作戰，在諸葛亮首次北伐前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滅反叛的孟達，斬除了魏軍的可能威脅；在與東吳的數次交手間，司馬懿更展現了傑出的軍事才華，讓孫權在江夏攻略方面幾無收穫。

¹⁰²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338

¹⁰³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¹⁰⁴ 尤其戰爭時間，蜀軍隨時得出動攔截前來支援的魏軍，野戰部隊受制於掩護交通線、警戒、牽制等任務需求時，損益連弩更扮演著消耗敵軍戰力的重要角色。見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53

¹⁰⁵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55

¹⁰⁶ 唐·房玄齡等《晉書》〈帝紀第一·宣帝〉

魏明帝曾表示除了司馬懿外，沒有人能擔負起西部戰線的重責大任。¹⁰⁷接管西線指揮權後，司馬懿遣費曜、戴陵領四千軍馬留守上邽，其餘部隊盡數前往解祁山之圍。張郃認為分部分軍士駐紮雍、郿，司馬懿則認為前線軍隊僅能勉強抵擋蜀軍攻勢，若再分散兵力，將導致魏軍因兵勢不集中而戰力不足。¹⁰⁸其實魏軍兵員眾多、又居守勢，縱然蜀漢傾力而出也未必較魏軍具戰略優勢；且蜀軍長途攻來、必留守軍士於途中要塞，蜀魏第一線交手的兵力自然以魏較為充裕。司馬懿之所以選擇將全數軍力投注至最前線，應是對諸葛亮的戰略設定有一定的研究與了解，且對於諸葛亮的保守策略路線有相當的把握。曹魏一代名將司馬懿，在與諸葛亮正式交鋒前，就已經展開一連串的心理戰。

面對魏軍大舉來攻，諸葛亮一方面分兵留守、一方面親率部隊突襲上邽，郭淮、費曜領軍出城反擊，為諸葛亮所破、大敗而走。蜀軍趁魏軍反攻前的空檔，大肆收割上邽附近的麥子以補充軍糧、舒緩持久戰造成的補給壓力。司馬懿聞訊即返回上邽救援，與諸葛亮在上邽之東相遇，司馬懿收斂部隊、憑恃天險而不進擊，兩軍遙遙相望而未交戰。

諸葛亮求戰不得，蜀軍主力於是轉進駐鹵城，司馬懿也率軍跟蹤蜀軍。張郃分析戰局，認為蜀軍遠道而來、物資供應困頓，必講求速戰速決；祁山魏軍已知悉關中援軍在側待命，士氣高昂，蜀軍短期內必無法攻克；若司馬懿繼續固守上邽，便能與祁山防線共同構築令蜀軍進退維谷的作戰環境，待蜀軍糧食耗盡，即可不戰而勝。反之，倘若司馬懿遣軍跟隨蜀軍卻不出擊，恐將坐失民望、亦將打擊魏軍內部的士氣。¹⁰⁹司馬懿未聽從張郃的建議，繼續追蹤諸葛亮直至鹵城，大軍行至漢水北岸時即停止前進，搭設防禦工事，自此戰事陷入僵局。

司馬懿堅持追蹤諸葛亮的原因，應是希望藉此縮小蜀軍的活動範圍以持續施壓，一方面以固守策略讓蜀軍求戰不得、一方面尋找出擊機會。在這種作戰模式下，除了糧草供給，蜀軍的作戰熱情也在持續消耗，以此等待敵軍士氣低落時一舉反擊，不失為相當高明的戰術。

不過，在司馬懿成功擊潰蜀軍士氣之前，魏軍內部的輿論壓力便已徹底破壞了他的計劃。如張郃所料，司馬懿逼近蜀軍卻選擇保持守勢的作法，引來魏軍將領們的不滿。賈栩、魏平等將領紛紛請求出戰，司馬懿不同意，於是魏軍士卒間逐漸流傳：「公(司馬懿)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請戰的將領也日益增多。

司馬懿終於按耐不住，遣張郃自南攻擊王平、自己則親率大軍向諸葛亮軍團前進。諸葛亮遣魏延、吳班與高翔等軍反擊，魏軍不敵、兵勢大亂，死傷慘重、物資多為蜀軍所奪。張郃遇上王平所帶領的無當飛軍，這群由南中青壯所組成的勇猛軍隊力守祁山，魏軍屢攻不克；又聞司馬懿軍失利，張郃便逕行退兵。

經此一戰，蜀魏雙方情勢大為轉變，原本企圖瓦解蜀軍戰鬥意志的魏軍，在士氣上明顯處於下風。戰情至此進入關鍵時期，尤其對於蜀軍而言，一舉攻堅、破壞魏軍防守佈局，本次北伐是大有可為的。豈料，此時蜀軍竟因糧草不繼而被迫班師回朝，錯失了為北伐取得開創性成就的大好良機。有關諸葛亮撤軍的原因，留待下一小節詳述之。

聞知諸葛亮大軍撤退，司馬懿立刻派遣張郃加以追擊。張郃表示反對，然而司馬懿並不接受張郃的反對，張郃只得遵守軍令、率軍追擊。¹¹⁰追至木門，蜀軍埋伏於高處、以亂箭射

¹⁰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

¹⁰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

¹⁰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

¹¹⁰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張樂于張徐傳〉引《魏略》：「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擊追趕的魏軍，張郃身陷連弩箭陣、被飛矢射中右膝。張郃是曹魏諸將中的佼佼者，他擅長規劃行軍路線、算計地理形勢與戰局演變，連諸葛亮都相當忌憚。張郃的死對於曹魏戰力無疑是一大重挫，也是司馬懿應擔當起的重大責任。

第四次北伐初期，司馬懿表現了大膽的用兵謀略和縝密的思慮，利用對諸葛亮心理的掌握，將曹魏軍力集中調度、大幅增加指揮官的調用人員。之後又利用步步為營的方式，不斷壓縮蜀軍的生存空間，以製造令敵軍窒息般的封鎖局面。起初司馬懿如聽從張郃建議，堅守曹叡交代的「壁堅拒守，以拖待變」原則，蜀軍一時間也無計可施；既決定與鹵城蜀軍對峙，就應固守己見、堅不出戰。可惜司馬懿終究為流言和部將埋怨所動搖，發動了一場損失慘重的惡戰；北伐結束前更因為錯誤判斷，葬送了名將張郃的性命。由此吾人發現，司馬懿儘管同樣精於權術、謀劃，在堅守原則方面，諸葛亮還是略勝一籌的。

3-4-3 蜀漢內部的糾紛危機

諸葛亮之所以忽然撤退，其實是收到劉禪所傳的諭旨而奉命收兵的。當諸葛亮返回成都，才赫然發現竟然是中都護署府事李嚴遣其參軍假傳諭指；李嚴見諸葛亮回朝，猶故作吃驚表示：「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一方面又上奏劉禪：「退兵只是為了引誘敵軍以與之作戰。」這種拙劣的謊言自然很快就被拆穿，諸葛亮出示李嚴先後親筆的書信，當中的矛盾錯誤立即表露無遺。於是諸葛亮上奏指責李嚴，李嚴被奪去官位、廢為平民。¹¹¹

李嚴是南陽人，在蜀漢的政府結構中屬於荆楚集團。他原為劉表旗下的職吏，後投靠劉璋、擔任成都令。李嚴的辦事能力一直享有相當高的評價，劉備入蜀後，李嚴曾在兵力居於劣勢的情況下殲滅盜賊馬秦、高勝的數萬餘眾，為劉備所重視。劉備臨終前，李嚴與諸葛亮同為受命大臣。諸葛亮曾在孟達的信中，形容李嚴的處事能力如流水般的順暢，決斷事務方面也無所停滯。¹¹²以上種種可證明李嚴確實是難得的優秀官員。

不過，在蜀漢朝政的權力關係中，李嚴略傾向於地方軍閥。蜀漢建興八年，曹真率魏軍大舉攻來，諸葛亮調動李嚴移防漢中，同時表薦李嚴之子李豐為江州都督督軍，接管李嚴原本的職責。此舉可以用「嘉勉李嚴辛勞」來解釋，但實質上確可看出攏絡李嚴的意圖。此外，《諸葛亮集》中收錄諸葛亮與李嚴來往的書信，李嚴曾經勸諸葛亮接受九錫、受封稱王(後為諸葛亮嚴詞回拒)。李嚴之所以希冀諸葛亮的加封進爵，應是期盼自己能夠連帶獲得升遷，其以個人利益為重的心態相當明顯。

除了李嚴之外，長史楊儀與武將魏延的衝突更是日益升溫，兩人的爭執最終爆發並以魏延被殺終結。史書載諸葛亮珍惜楊儀的幹練、亦重視魏延的驍勇，不忍有所偏廢，「長恨二人之不平」¹¹³，可見諸葛亮縱然不滿亦無從介入二人的紛爭。蜀漢內部的矛盾，由於諸葛亮獨掌軍政大權而勉強維持表面的平和，其隱藏的危機即一旦諸葛亮去世，維繫這些爭端的平衡便瞬間遭到破壞，蜀漢更可能面臨一夕之間崩毀的危機。筆者認為，明智如諸葛亮自然知悉這些隱憂所帶來的威脅，然而蜀軍內部人才已日益減少，承受才俊凋零的心理壓力，諸葛亮亦不得不任用部分人品略有瑕疵卻相當幹練的官員、武將。

¹¹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¹¹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¹¹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第五節 第五次北伐

經歷了接連五年的軍事動員，蜀魏雙方皆暫時偃旗息鼓。第四次北伐結束後，諸葛亮至黃沙城勸農，同時製做木牛流馬、籌措軍隊裝備並訓練士卒。¹¹⁴蜀漢建興十一年冬天，蜀軍將糧米集中至斜谷口、修築糧食儲所，為下一次的北伐進行前置作業。隔年春天，諸葛亮親率十萬大軍出斜谷，發動第五次北伐。

3-5-1 重新檢討的戰略思維

第四次北伐的撤軍，表面上雖是受騙於李嚴假造的諭旨，然而亦可知蜀軍中必有嚴重的糧食補充困難。否則當時正值戰爭關鍵期，諸葛亮自然知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怎肯輕易收兵？

糧食運輸對於蜀軍而言，一直是難以克服的障礙。北伐路線山勢險峻，牛車、馬車行進不便，且受制於天氣狀況的影響¹¹⁵，補給線因此相當不穩定。有鑑於此，諸葛亮曾在第四次北伐時使用木牛，嘗試以基礎機械代替獸力運輸。第五次北伐時，更進一步使用體積較小的流馬，以此強化後勤能力。流馬只需一人即可操縱，由於它的單輪結構，比起木牛更能適應彎曲的山路。木牛流馬不僅為蜀軍降低輓馬、人力與糧秣的消耗，更增加蜀漢軍事動員的彈性(可減省役仗數量、使其能繼續耕種而不奪其時)。¹¹⁶

由本次北伐大幅修正糧食運輸的舉動判斷，此次戰事勢必將成為更費時的持久對峙。連年出師無功，讓諸葛亮深切檢討、反省，本次進軍前的籌備動作亦顯得更為繁細。¹¹⁷針對屯駐漢中的部隊，諸葛亮實行「十二更下，在者八萬」的輪轉制度。¹¹⁸透過人力的來往流動、兼顧前線作戰和後勤資源累積，以確保蜀軍得以應付持久戰所帶來的龐大開銷。諸葛亮在戰前將糧食聚集至斜谷最前線，頗有傾力一戰的意味，或許也是受到前幾次失敗的刺激、諸葛亮又已邁入中年，企圖利用此次進攻機會放手一搏吧！

曹魏方面，仍由司馬懿出任總指揮，督領關中各路軍馬。魏明帝鑒於諸葛亮此次動員人數達十萬之眾，恐前線有失，特別派遣征蜀護軍秦朗率領步騎二萬，赴前線受司馬懿調度。第四次北伐時，司馬懿因按捺不住而出擊反遭慘敗，此事再次確定了曹魏未來的防守準則。簡而言之，魏軍本次的戰略方針仍維持「堅壁清野」的消極防守，利用守方優勢、待敵自退。

魏軍以固守為主的戰略，諸葛亮自然心裡有數。問題再次回到原點，諸葛亮面臨的困境仍是如何在補給匱乏前、突破魏軍的拖延戰術。尤其此次蜀軍兵員龐大，其資源需求亦較前幾次更具壓迫感。除了操練軍士、強化陣圖和武器運用外，諸葛亮想到了另一項增強北伐威脅力的良策，便是發動多路並進的攻勢：與孫吳共同出兵。

長期以來，孫權一直試圖自曹魏手中奪下合肥，阻止魏軍水師由淮河進入濡須口、推進國防戰線¹¹⁹，雙方也因此發生了兩次惡戰。東吳嘉禾二年(西元 233 年)，孫權率大軍包圍合肥

¹¹⁴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¹¹⁵ 如第四次北伐即因秋夏之際，天氣久雨不晴，使李嚴運糧工作受到阻礙。見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¹¹⁶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52

¹¹⁷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頁 339

¹¹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郭沖五事》，其中紀載諸葛亮體恤士卒，面臨魏軍大舉襲擊之際，仍堅持讓士兵返鄉。此事雖不可盡信，但可推知諸葛亮頗得軍心，而蜀軍也因此輪轉制，增強其戰鬥意願。

¹¹⁹ 倪振金《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研究》，前引書，頁 179

新城，為滿寵所擊潰。隔年，諸葛亮發動第五次北伐，同時遣使請求東吳出兵。孫權認為曹魏西部戰線吃緊，利用此時北進有利可圖，於是派遣張承、孫韶進軍廣陵、淮陽，陸遜協同諸葛謹屯駐江夏、沔口，孫權則親率大軍攻向合肥新城。¹²⁰吳蜀聯軍向魏軍自四個方向施壓，此為南部聯盟首次攜手出兵，大抵符合《隆中對》對於北伐的戰略規劃精神。

3-5-2 諸葛亮時期的結束

早在蜀軍發動攻勢前，司馬懿所統領的二十餘萬魏軍便以在渭水兩側防堵蜀軍來犯。¹²¹諸葛亮於是下令於渭水南岸紮營，進行分兵屯田以持久應戰。蜀軍軍紀良好，史書載「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¹²²透過與民同耕，蜀軍就地採集資源，和魏軍持續遙遙相望。

實施軍屯的同時，諸葛亮亦不放棄往各方向尋求打破僵局。他先後遣軍攻打北原、陽遂，可惜為郭淮所預料，蜀軍為魏軍所阻、無法前進，諸葛亮只得撤返五丈原。¹²³當時魏明帝欲親征東吳，遣使囑咐司馬懿務必保持守勢以觀其變。雙方持續對峙達六個月之久。

五月中，孫權主力軍攻至合肥新城。魏將滿寵率人折斷松枝作為火把、以麻油引火，從上風處對吳軍發動火攻，破壞吳軍攻城器具、並在混戰中射殺孫泰。¹²⁴孫權原本推測關中戰事頻繁，魏明帝勢必不會遠離洛陽，豈料不久便聽聞曹叡率大軍南下。¹²⁵吳軍人數眾多卻為滿寵的百人部隊所傷，軍中許多士卒水土不服，士氣相當低落；聞曹叡御駕親征，孫權衡量得失後決定撤回建業，孫韶等人也收兵而歸，僅剩陸遜一路持續迎戰。

孫權的撤軍使蜀吳聯軍合力北上的形勢又歸於諸葛亮孤軍奮戰的苦境，蜀軍陷於無止境的對峙也漸感力不從心。此時諸葛亮應已為疾病纏身，自知今不如昔，因此數次遣軍向司馬懿挑釁、希望能引誘魏軍進行決戰。在始終不得與魏軍交戰的情況下，諸葛亮遣人餽贈司馬懿婦女的衣飾。雖然其用意仍是挑釁，筆者認為此手法略嫌粗糙，且司馬懿並非泛泛之輩，稍加思考即可察知諸葛亮的用意，此舉反而暴露諸葛亮渴望速戰的心理弱點。

不過，餽贈女飾尚有另一用途，即希冀能引起魏軍內部將領的憤慨，如同第四次北伐的情況、強迫司馬懿出兵應戰。司馬懿應亦識破此心理戰術，為此他故作怒不可遏、上表洛陽請求出兵。¹²⁶中央自知司馬懿的用意，於是順水推舟、遣衛尉辛毗持節至前線傳達固守指令，甚至還上演一場「辛毗阻軍」的戲碼¹²⁷。眾將多少知悉司馬懿實無戰意，可是朝廷既以下達不可出戰的命令，亦只得遵守司馬懿調度。

蜀漢建興十二年八月，蜀魏雙方對峙六個月有餘後，一代名相諸葛亮終於病逝於蜀軍營內，第五次北伐也就此告終。諸葛亮時期的結束，象徵蜀漢政權轉移至另一個新的階段，由以諸葛亮為核心的統治結構、轉為多人分權的制衡關係。姑且不論哪一種權力關係較好，自諸葛亮死後，蜀漢王朝再也找不到足以率眾對外擴張、興富漢室的政軍領袖了。¹²⁸

¹²⁰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¹²¹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前引書，頁 94

¹²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¹²³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滿田牽郭傳〉

¹²⁴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滿田牽郭傳〉

¹²⁵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吳主傳〉

¹²⁶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

¹²⁷ 唐·房玄齡《晉書》〈帝紀第一·宣帝〉：「亮復來挑戰，帝(司馬懿)將出兵已應之，毗持節立軍門，帝乃止。」

¹²⁸ 萬穎中《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90

第六節 小結

北伐是諸葛亮實踐蜀漢政治目標的最主要手段，歷經五年的休生養息，蜀漢先後發動長達七年的一系列征討行動，然而並未收到豐碩的成果，最後隨諸葛亮的病逝而結束。

第一次北伐，對於蜀軍而言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透過聲東擊西的方式，蜀軍一舉奪得涼州三郡、聲勢浩大，曹魏將領無不為之震驚。可惜在阻擊魏軍救援時，諸葛亮為快速提拔馬謖卻操之過急、馬謖恃其才而不聽號令，終於導致街亭大敗，第一次北伐的所有勝利亦皆化為烏有。

第二、三次北伐雖只是地區性的小規模爭奪戰，但依然維持與第一次北伐相同的奇襲模式，試圖以「攻其不備」取得勝利。可惜第二次北伐路線為曹真所料，陳倉太守郝昭又精於守城，蜀軍損失嚴重又未能在魏軍赴援前奪下陳倉。雖然第三次北伐陳式成功奪下陰平、武都，實際上只能鞏固蜀軍防線、確保領土完整，對於向外擴張卻沒甚麼助益。

曹真率魏軍大舉西征、受制於天氣惡劣而被迫撤兵。諸葛亮乘此良機，再次發動第四次北伐。由於蜀魏雙方交戰已久、漸能預測對方行蹤，北伐遂由奇襲戰轉為持久戰，以長時間的僵持取代短期的突擊作戰。另外，第四次北伐由司馬懿出掌魏軍統領，在佈陣、調度和部隊移動上，與諸葛亮展開決勝千里的心理戰。司馬懿意圖以圍堵策略擠壓蜀軍、迫其退兵，卻不能遏止營中將士的浮動，率然出兵招至大敗。諸葛亮雖因此取得進兵的良好時機，卻因糧食不繼和內部紛爭，只得含恨退兵，第四次北伐遂亦以無功告終。

第五次北伐諸葛亮再次修正軍隊規劃，由糧食運輸、軍隊制度等方面著手改革，力圖為蜀軍在持久戰中製造優勢。同時，諸葛亮遣使邀約孫吳共同發兵，由各方向進軍曹魏以令其南北奔波、首尾不能兼顧。可惜孫權未能堅持進軍，很快即為滿寵、曹叡所逼退，陸遜與諸葛謹於江夏亦僅收納降將、突襲市集，未能替蜀吳整體北伐製造較碩大的勝利。西線部分，司馬懿死守曹叡叮囑，又透過巧妙的戲劇手法平息營中將士的不滿，使諸葛亮百般挑釁都未能得戰。諸葛亮終於不堪憂勞，在北伐結束前就溘然長逝。

諸葛亮時期的結束，勢必對於蜀漢的政府組成和權力平衡造成巨大的影響，也代表一致向外的擴張時期進入尾聲。此後蜀中掌權者對於北伐看法不一，也未曾再出現一個足以統領全國軍政的領導者。

至此，蜀漢邁入後諸葛亮時期，天下大勢也有了新的變化方向。

第四章 後諸葛亮時期

第一節 後諸葛亮時期的政治局勢

諸葛亮病逝前，料知自己的死對於蜀魏雙方皆會造成嚴重影響，倘若操作不當，即有可能危及北伐軍的安全。於是事先吩咐眾蜀將各行其事、編擬接班人選，以應付諸葛亮身後的突發狀況。由於調度有方，諸葛亮去世後，姜維、楊儀等人順利誅殺了叛變的魏延¹²⁹，並以虛張聲勢的方式嚇退司馬懿的追兵¹³⁰。大軍返抵蜀境後，蜀後主劉禪按照諸葛亮的遺志，重新作了一番新的人事調整。

4-1-1 權力結構的轉變

蜀漢建興十二年(西元 234 年)，蜀漢左將軍吳壹受封為車騎將軍，統領漢中地區軍隊；原丞相留府長史蔣琬進為尚書令，統領國家政事。一般多以蔣琬為諸葛亮的繼承者，史書載諸葛亮曾向劉禪密表，指定蔣琬接管大政。¹³¹蔣琬去世後，由費禕接掌政務、出任大將軍。

蔣琬、費禕輔政期間多駐紮在蜀軍前線，指揮軍事調度；尚書令董允則居成都，督導朝政運作。董允為人正直、嫉惡如仇，時常進忠諫、糾正劉禪作為，劉禪對其深感敬畏。宦官黃皓意圖干政，董允屢次加以指責，黃皓恐懼而不敢為非作歹。¹³²蔣琬、費禕領外，董允督內，蜀漢朝政一時欣欣向榮。

雖然蜀漢政府的權力結構依然維持「繼承」的體制，與諸葛亮時期不同的是，已經沒有一人獨攬朝政的形勢。蔣琬當政時，一方面提拔姜維為涼州刺史，持續規劃向北進軍；一方面將益州太守之職讓予費禕。透過權力的釋放，讓蜀漢集團的統治核心漸趨相互制衡，由數位官員各掌其職、分擔責任。這種結構形式，主要原因在於蔣琬等人自知能力不如諸葛亮，故以集合眾人之力，彌補諸葛亮逝世對於蜀漢內政的傷害。¹³³

不過，隨著董允、費禕相繼去世，情況遂有所改變。姜維在費禕去世後晉封大將軍，在軍事指揮權上高於所有武將。但與先前不同的是，姜維對朝中內政逐漸失去掌控能力。董允去世後，蜀漢官場風氣急速敗壞，侍中陳祗與黃皓互為表裡、操弄朝政，由於擅於揣摩上意、取悅劉禪，因而頗得寵信。¹³⁴姜維曾上書要求劉禪斬殺黃皓，為劉禪拒絕後深恐為黃皓所害，遂屯駐沓中。後來黃皓甚至意圖以右大將軍閻宇取代姜維，姜維驚懼、甚至不敢返回成都。堂堂蜀漢大將軍竟連首都都不敢歸返，除了朝政的敗壞外，也顯示蜀漢決策核心的結構已漸趨混亂、解體。

4-1-2 人才的枯萎

人才匱乏的問題，自後主執政以來就一直深深困擾著當政者。蜀漢集團集結之初，其中成員來自全國各處，由劉備的個人魅力將眾人合而為一，在亂世中打下一片江山。然至後主執政時期，原本隨劉備入蜀、由荆楚地區遷來的大臣逐漸老邁，諸葛亮原本便將益州士人大

¹²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¹³⁰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

¹³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³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董劉馬陳董呂傳〉：「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¹³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引《漢晉春秋》

¹³⁴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董劉馬陳董呂傳〉

多安排在權力核心外圍職位，在後繼者的安排上亦仍以荆楚人士作為決策階級。蔣琬、費禕等人未能在這方面作出大幅度改革，蜀漢人才任用因此逐漸趨於無才可用的窘境。

蔣琬、費禕兩人輔政期間雖無重大政績，但在整肅政務、維持國事昌明方面，表現相當傑出。蔣琬曾試圖伐魏已擴張版圖，但在實踐之前便因身患重疾而未能出兵；費禕氣量寬宏、禮賢下士，處事果覺能斷，卻不幸為魏降將所殺。¹³⁵蔣、費雖不及諸葛亮，但具有整合全體官員、維繫蜀漢官府的集體行政，可惜輔政時間都過於短促。但至姜維掌政時，成都與漢中戰區就逐漸形成兩個獨立的行政結構，競爭逐漸取代合作關係。蔣琬和費禕的早逝，使蜀漢失去足以延長國祚的「太平時代」，對於蜀國無疑是嚴重的損失。

人才的枯萎亦表現在蜀漢北進的行動中，導致姜維數次行動皆戰果不彰。諸葛亮北伐時猶有魏延、高翔等大將可以獨當一面，後諸葛亮時期的姜維僅能獨率蜀軍與各路魏軍纏鬥，蜀將廖化、張翼雖以果斷著稱¹³⁶，畢竟不及魏延之流。姜維北伐後期甚至得仰賴降將夏侯霸，可見蜀中人才危機有多麼迫切了。

¹³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³⁶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鄧張宗楊傳〉

第二節 後諸葛亮時期的北伐

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和姜維等人並沒有放棄其遺志，依然持續籌措北伐事業。由於三人的個性、背景相異，對於北伐的態度和戰術主張也各有不同。由於蔣琬、費禕兩人輔政時間不長，北伐仍以姜維為主要執行者，筆者遂將此時段的向外擴張集團稱為「姜維集團」。

4-2-1 姜維集團的戰略思維

蔣琬接任大將軍職位後，認為諸葛亮數度出兵秦川，由於地形險惡、屢攻不克，不如遣軍乘船由漢水順流而下，突襲魏興、上庸。適逢蔣琬舊疾復發，此計並未即時執行；諸將皆認為倘若攻擊不如預期成功，必須逆流而上才能撤返蜀境，過於冒險、實非良策。¹³⁷蔣琬此計固然不是萬全之策，但他的戰略思考其實是針對諸葛亮北伐的缺失所作的反省：由於第四、五次北伐，蜀軍為減緩糧食壓力、被迫在漸趨僵持的戰局中爭取交戰機會，形勢因而轉由防守的魏軍所主導。為避免這種情況再次發生，蔣琬退回北伐戰略思考的原點：突襲。與諸葛亮前三次北伐的主旨相同，這類型的進攻形式旨在「攻其不備」之效。「突襲魏興、上庸」之計必然經過蔣琬初步的評估和分析，順流而下的攻擊確實是一著險棋、但也是一路奇兵，單以突破困境的目的性而言，蔣琬的思維確有其可取之處。

繼蔣琬之位的費禕，精於政事、個性謹慎而樸實。蜀漢延熙七年(西元 245 年)，魏少帝曹芳詔大將軍曹爽發兵討蜀，蔣琬當時屯於涪縣，距離戰爭前線有段距離¹³⁸；費禕接獲消息後，從容地領軍赴前線救援¹³⁹，佔據山嶺截擊曹爽，魏軍於山間陷入苦戰、曹爽勉強脫身。¹⁴⁰費禕在指揮作戰方面的傑出能力，在此戰中不言而喻。費禕長期擔任諸葛亮的幕僚，他在交際、溝通能力上具有過人的長才，對外多次出使孫吳、對內則調合魏延和楊儀的紛爭，由此也略可見其個性較蔣琬等人內斂。費禕輔政期間，姜維曾數次要求出兵曹魏，皆為費禕所節制、「與其兵不過萬人」。¹⁴¹按費禕的想法，以諸葛亮超乎常人的才能由不能定中原，他與姜維之輩自不太可能有亮麗的成績；與其勞師動眾，不如閉關休息、養精蓄銳，待後繼有才者接任、再行北伐之舉。¹⁴²費禕在三人之中是相對保守的，以「鞏固國防」為抗魏之第一要務。

姜維在三人之中最為激進，他繼承諸葛亮遺志、對曹魏發動一連串的征討行動。姜維與蔣琬、費禕出身背景不同，他在曹魏擔任中郎時，就實際參與討論天水郡的軍事規劃了。¹⁴³歸降蜀漢後，由於諸葛亮的刻意栽培，姜維在北伐軍中亦扮演著重要軍事將領。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姜維較為傾向以武力降服曹魏，也積極主張發動北伐。費禕去世後，姜維幾乎每年都動輒出動數萬蜀軍，不斷向魏軍發動攻勢。如此頻繁的軍事行動¹⁴⁴，略可看出姜維在戰前

¹³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³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琬承命上書曰：『...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蔣琬遂還住涪。」蔣琬認為涪縣可作為北線戰爭的指揮中心，增援方便；但馬植杰先生則指駐紮涪縣略嫌遙遠，致使曹爽伐蜀時，前線實處於兵力空缺的情況。見馬植杰《三國史》，前引書，頁

¹³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延熙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¹⁴⁰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引《漢晉春秋》

¹⁴¹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⁴²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引《漢晉春秋》

¹⁴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

¹⁴⁴ 蜀漢延熙十六年二十年，姜維連續五年都發動北伐戰爭。

規劃並不如諸葛亮詳細，亦沒有在退兵後完成確實的檢討和修正工作。相較於諸葛亮的北伐，姜維不僅未能有效改善糧食運輸問題，更沒有思考應付曹魏援軍的反制系統¹⁴⁵。此外，姜維在攻擊時機的挑選上亦略嫌草率，未能把握「多路同時進攻」的交戰策略¹⁴⁶，幾次北伐並未替蜀漢帶來實質利益、反而嚴重打擊蜀漢的經濟和國力。

姜維的擴張行動之所以效率不彰，有幾項原因：首先，姜維本屬曹魏，後因諸葛亮的發掘、刻意栽培而步入蜀漢中心，但與蜀中權貴並無交情、個性也不善交際，其政治主張因此一直未能獲得其餘官員的支持；其次，姜維入主權力頂峰時期，也正是蜀漢國勢衰敗、焦點政策改變的轉捩點，在朝的黃皓等人皆與其立場相異，加之費禕死得太突然，並未替姜維安排接濟人脈，使他在權力鬥爭中更形孤立；最重要的是，當時蜀漢國力與曹魏相差甚遠，姜維的最佳攻擊路線應採取第四次北伐的隴右突破，以決戰性的大規模野戰徹底摧毀曹魏的關隴軍團。然而姜維卻選擇以隴西山地作為主要戰場，不僅難以與人數眾多的魏軍對抗，更大量消耗蜀國的錢財、物資。¹⁴⁷

須知北伐對於弱小的蜀國而言是遊走於國勢極限的危險行為，惟有掌控民生經濟和軍事消耗的巧妙平衡，才能在擴張的同時維繫蜀漢的生存。諸葛亮一人獨攬軍政大權，對內的資源採集和開發都有相當詳細的政策規劃和確實的實務執行。相反地，姜維雖敏於軍事、深解兵意，在內政治理方面卻沒什麼本事；加之姜維輔政時，朝中已無足以節制黃皓並推動內修政理之能人，故蜀漢很快就面臨國庫破產的威脅，人民心生怨恨、隴西一帶騷動不寧¹⁴⁸。

4-2-2 蜀漢集團的鬆動

姜維不斷向外征討、黃皓在朝中則恣意弄權，蜀漢因龐大的軍事開銷而面臨嚴重的國庫空虛問題，卻因奸人當道而無法有效進行處理。蜀漢發展至此已找不出任何生氣或活力。¹⁴⁹

姜維因接連軍事行動的失敗，在朝廷內鬥中漸趨劣勢，怕遭黃皓謀害而屯住沓中，無形中增添蜀軍指揮上的困難；軍事總帥卻不肯進入首都會見君主，內外兩股行政勢力形同陌路，無法發揮互補的良善功能。黃皓政事不理，僅熱衷於將心腹安插至各重要職位，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實力。朝中忠良不敢得罪黃皓，遂三緘其口、不進忠諫。蜀漢政治結構由內部癱瘓，僅餘地方官援各行其事、姜維等人籌措軍備、防禦曹魏。

後主劉禪因董允去世，遂縱情於酒色、荒淫無道。身為君主，行為不知檢點甚至染指屬下妻眷，也因此破壞了朝中就有良善風俗。¹⁵⁰吳使薛珣對於當時蜀漢國政的批評：「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而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¹⁵¹正是蜀國腐敗的寫照。

外患壓力漸增的同時，蜀漢內政的腐化已經逐漸侵蝕立國根基，猶未見任何力挽狂瀾的作為，蜀漢的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¹⁴⁵ 姜維於延熙十六年、十八年發動的兩次北伐，皆因魏將陳泰來援而退兵。見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⁴⁶ 延熙十九年因蜀將胡濟未依期與姜維會師於上邽，導致蜀軍在段谷為鄧艾所破，姜維聲譽亦嚴重受損；延熙二十年姜維趁諸葛誕造反時進軍秦川，卻未試圖與諸葛誕互相溝通、合作，終以諸葛誕被滅而撤退。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⁴⁷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94

¹⁴⁸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⁴⁹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93

¹⁵⁰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載劉琰之妻疑似在進宮祝賀太后時與劉禪通姦，劉琰憤而以鞋擊打其妻之面；後劉琰竟因此被定罪，於市集中斬首棄屍。之後再也沒有大臣的妻女進朝祝賀太后了。

¹⁵¹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張嚴程闕薛傳〉引《漢晉春秋》

第三節 鄧艾與鍾會的入蜀行動

曹魏在面對蜀吳雙方的策略上，一向遵守「先滅吳、次攻蜀」的原則，魏明帝曾諮詢司馬懿對此戰略方向的想法，司馬懿直接表明應以水陸兩路大舉攻吳。其後曹魏方面的軍事部署大多亦以東向為主，因此蜀漢官方也認定魏軍主動出擊的機率並不高。

司馬昭認為姜維屢次騷擾邊境，認為蜀國人民疲乏、物資枯竭，有可乘之機。時鍾會擔任司隸校尉，頗得司馬昭青睞，他認為伐蜀可行，亦參與地形評估、形勢分析。¹⁵²為掩人耳目，司馬昭一方面敕令青、徐、兗、豫、荆、揚等州建造船艦，刻意佯裝要討伐東吳之貌；一方面封鍾會為鎮西將軍，督領關中諸軍、伺機行動。姜維探知鍾會在關中整治兵馬，於是表奏後主，請求派遣張翼、廖化等軍固守陽安關和陰平橋頭。姜維的奏疏被黃皓以「鬼巫謂敵終不自致」為由而壓下，並未在蜀漢朝中引起警惕作用；姜維本人對於自己的猜測也沒有十足把握，故亦未調整防禦陣線。¹⁵³

由於錯誤的判斷和未被重視的警告，直到蜀漢景耀六年、魏軍大舉入蜀時，蜀軍才終於察覺事態嚴重。司馬昭仔細觀察姜維的軍事佈署後，決定以孤立姜維的方式突破益州的大門。命鄧艾由狄道襲擊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則自祁山進駐武街，斷絕姜維退路；鍾會率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挾優勢兵力強襲漢中。¹⁵⁴另一方面，姜維連忙命令廖化趕赴沓中以為援軍，張翼、董厥則領軍前往陽安關口協助防守。

姜維在漢中方面的防務策略與以往的戰術不盡相同。他放棄軍事扼要的守備方式，撤去周圍守兵，以「堅壁清野」的方式引敵進入平原地區，消耗其兵糧、伺機反擊。此戰術確有其功效，然此次鍾會率領數萬大軍，允許對方進入平原地區，等同提供整飭軍形的良好場地。而姜維又因北伐重點為隴西地區，漢中佈防的部隊不足以死守待敵之衰，姜維這樣的戰略因而成爲一項失策。¹⁵⁵在鍾會的強勢攻擊之下，蔣舒率眾出降、傅儉惡戰而死，關口淪陷、漢樂二成無所依恃，漢中、武都迅速淪陷，蜀漢最前線徹底崩盤。

另一方面，遭逢數路魏軍左右夾擊的姜維，陷入激烈苦戰。姜維深知戰局情勢危急，於是決定不計一切代價殺出重圍，途中飽受鄧艾糾纏與諸葛緒壓迫，在這絕番死撤的過程中，本部師死傷泰半，由此也證明姜維駐紮沓中之於戰略上確實是嚴重的錯誤。¹⁵⁶姜維、廖化捨棄陰平退守，與張翼、董厥等人會師，決定專心防禦劍閣。劍閣地形險要，姜維憑藉過人的指揮能力，在山峻兩側佈署弩兵，以連弩陣攻擊來犯的魏軍。鍾會屢攻不克，戰爭陷入膠著。

十月冬天，鄧艾率軍翻越摩天嶺，歷經修築棧道、攀木緣崖的艱苦過程，自陰平取江油、進克涪縣擊殺諸葛瞻，直逼成都。¹⁵⁷此舉震撼蜀國所有君臣將領，也打亂了姜維的防禦陣勢。鄧艾勢如破竹，迅速攻至成都城下，劉禪大為惶恐。群臣有的主張投奔東吳、有的提議逃往南中，然而以譙周爲首的益州地主集團卻主張投降曹魏¹⁵⁸。劉禪最後爲朝廷內外壓力所迫，出城向鄧艾請降。自西元 221 年劉備於成都稱帝，蜀漢政權至此宣告滅亡。

¹⁵²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

¹⁵³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⁵⁴ 唐·房玄齡《晉書》〈帝紀·文王第二〉

¹⁵⁵ 饒勝文《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前引書，頁 240

¹⁵⁶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前引書，頁 196

¹⁵⁷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

¹⁵⁸ 蜀漢政權並不代表益州地主集團的全部，蜀漢一旦崩潰，反可順勢驅逐來自荆楚地區的地主勢力，使益州土著地主集團的利益獲得更長足的發展。除此之外，蜀中人民長年受賦稅、戰亂所苦，期待和平而不願持續割據。見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前引書，頁 97

第四節 小結

諸葛亮死後，蜀漢的軍政大權由一人兼掌轉為數人共同分擔責任和權力，蔣琬、費禕和姜維三人依序成為決策核心人物，同時也有如吳壹、董允、鄧芝等人掌管內政或軍事，形成多人共治的局面。早期蔣琬、費禕時代，朝廷有董允主持，內外交互合作、支持，造就了一個高效能的行政團隊；至姜維執政時，朝中政權逐漸為黃皓、陳祇所掌握，朝廷內外的行政步調開始有所差異，姜維和黃皓間亦形成鬥爭關係，也因此埋下蜀漢滅亡的引線。

另一方面，由於最初隨劉備入川的謀臣大多老邁、去世，蜀漢集團逐漸面臨人才凋零的窘況。益州人士大多被安插於決策階級之外，荆楚人士的後代卻未見傑出之輩繼續承先啓後。蔣琬、費禕壽命過短，未能為蜀漢守長久之太平；將領的匱乏也使姜維在北伐行動中捉襟見肘、難以有所成就。人才的枯萎逐漸成為蜀漢的重大問題，對於蜀國國勢更是雪上加霜。

蔣琬、費禕和姜維三人的戰略思維，在攻略態度上以姜維最為激進、費禕最為保守。蔣琬試圖修正諸葛亮的北伐策略，回歸奇襲戰的模式；費禕主張守成以待有能之士，認為堅守領土是最好的戰略；姜維憑藉對興富漢室的理想抱負，連年大舉北伐，卻未能掌握進攻要旨，依舊受制於曹魏的堅守戰術而不能有所突破。

姜維經年累月的勞師動眾使蜀漢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而腐敗的朝政無法對此問題的有所改善。姜維身為大將軍卻不得人脈，在權力鬥爭中漸趨下風而退避沓中，造成行政團隊內外分裂。劉禪昏庸無道、黃皓禍國殃民，混濁的朝政破壞了長期建立的行政機制，也讓朝中官員人人自危。

蜀漢景耀六年，鍾會、鄧艾等人奉司馬昭之命大舉征蜀，黃皓亂政竟使姜維直到敵軍進入川中才得以調兵抵擋。司馬昭巧妙利用姜維在佈署上的矛盾¹⁵⁹，以數路軍隊糾纏姜維、趁勢攻打漢中。由於防禦戰術運用錯誤，漢中地區的防線為魏軍以兵員優勢一舉攻陷。姜維雖一路抵抗鄧艾、王頌追擊，平安返抵劍閣，但本部兵力已損失嚴重。其後儘管姜維等人力守劍閣、遏阻鍾會的攻勢，鄧艾的越嶺突襲終究成功地穿越蜀軍防線、進逼成都，劉禪被迫出降、蜀漢因此滅亡。

在後諸葛亮時期的政治局勢中，可以明顯看出許多應受到改進的缺失。造成這些缺失的原因繁多，包含劉禪本身的闇弱、姜維不善交際的個性與蔣琬、費禕的早逝。筆者認為，諸葛亮在身後繼承者的安排上並無缺失，後諸葛亮時期的決策集團未能發揮其應有能力，主要仍是受制於蜀國的先天障礙和時運不濟；此集團在蜀漢末年迅速萎縮乃至漸失影響力，其負面結果應如上述原因，而不能視為諸葛亮的決策錯誤。至於姜維北伐的評價，留待下一章節另闢論述。

¹⁵⁹ 此矛盾實非姜維之失、而是黃皓之過。由於黃皓的政治迫害，姜維被迫屯駐沓中，主力軍隊遠離防守最前線的漢中地區，因而無法在戰爭第一時間趕赴前線支援和坐鎮指揮。

第五章 北伐行動的評價

第一節 北伐行動的得與失

嚴格來說，北伐對於蜀漢並未帶來多少領土擴張方面的實質利益。諸葛亮首次出兵祁山時雖曾一舉奪得涼州三郡，但很快又被魏軍搶回。第三次北伐，蜀軍成功取得陰平、武威，並在漢中外圍建立漢、樂兩城。這兩處領地的攻佔和衛城的搭築，確實有效強化蜀漢的北線防守能力。鄧艾、鍾會入蜀時若非姜維操作失當，以此地形勢，必可堅守數月之久。

單就北伐行動本身而論，每次軍事進擊都必須花費大量的錢財、糧草和人力，儘管諸葛亮善於永續經營、有效保持蜀漢資援的流轉不殆，行動本身所造成的勞民傷財仍是不可否認的。此現象至姜維北伐時期則更為顯著，他在段谷為鄧艾所擊潰時，更曾造成軍民怨恨，可見北伐確實為蜀中人民帶來龐大的壓力和負擔。

但筆者認為在評斷北伐的得失時，應將諸葛亮對於北伐的前置作業亦列入評列項目。倘若蜀漢只希冀成為一偏安政權，則未必會有平南之舉。南蠻的平定對於蜀漢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收穫，透過對於南中地區的政治掌控，蜀漢不僅獲得豐富的天然資源、珍貴寶物，更取得充足的耕種人力和兵員補給。南蠻青壯組成的無當飛軍強悍善戰，在第四次北伐中以少數兵力迫使張郃大軍無從推進戰線。此外，諸葛亮將部分南中居民遷入蜀境，一方面促進漢夷融合，一方面也增加對南中地區的掌控，這對僅有一州領土的蜀漢是不無小補的。

諸葛亮為了讓蜀漢迅速恢復擴張能力，針對國內經濟體制、政府組織與人事任用進行一系列詳細且深入的改革。經歷諸葛亮的勵精圖治，益州氣象為之一新，政通人和、物產豐饒。蜀漢能以一州之力屢次侵略曹魏，可見其國力部分確實相當雄厚，這是東漢末年的益州不可能辦得到的。

另外，諸葛亮在北伐的同時也大量蒐集可得資源，強化蜀漢國力。諸葛亮在首次北伐中發掘姜維，將他從曹魏的無名小將調教為蜀漢的首腦人物，而姜維在蜀漢末年持續扮演捍衛益州安全的主要角色。另外，諸葛亮和姜維在北伐的同時，皆曾遷徙居民至蜀境，這對於蜀國的人力供給、勞動力提升都是相當重要的。

平心而論，北伐對於蜀漢可說是利弊參半。儘管蜀軍連年出師造成的財政壓力對蜀漢國力確實有所損害，但其所帶來的益處也為蜀漢創造更多發展的契機。筆者認為，蜀漢末年的姜維北伐確實過於頻繁，加上他忽略永續發展且適逢朝政敗壞而導致蜀漢迅速毀滅。但是吾人不應以此作為批評北伐的論據：首先，諸葛亮的每次軍事行動都經過詳細策劃和評估(而這是姜維所不及的)，即便蜀軍遭受挫敗、國勢也不會因此受到嚴重影響；其次，北伐行動本身對於蜀漢並不是毫無益處，蜀漢末年的失敗實肇因於姜維的操作不當；最重要的是，上述所列舉北伐之利益，都是必須透過實際行動才有可能獲得的。若單以結果批評北伐是自取滅亡之舉，筆者認為此舉缺乏對歷史的同情心理；將思維基礎構築於北伐前的既有事實和時局變化上，才能作出真正客觀的評論。

第二節 北伐行動的整體意義

就現實層面而言，北伐行動是蜀漢向外擴張的手段。蜀漢領土狹小、國力有限，欲與魏吳兩大強權平起平坐，以軍事攻擊拓展新的財政收入源流，是最直接且有效率的手段。蜀漢地處益州，雖然地產豐饒、多天險可恃，畢竟不敵曹魏的半壁江山和千軍萬馬。以地理形勢分析，蜀漢北境邊防面對的是來自涼州和司隸區的兩面威脅，一旦魏軍以兵力優勢壓境襲來，蜀軍縱有地形之利，也未必能抵擋魏軍的強勢突破。藉由北伐，蜀軍得以將北部防線佈置得更為完整；且倘若蜀軍能攻下長安，不僅能直接威脅魏國首都洛陽，也能藉此孤立雍、涼二州的魏軍，雙方之間的勢力消長必大幅改觀。

由精神層面而論，筆者認為，蜀漢集團的存在價值，即是「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政治目標。換言之，先帝劉備之所以能從一支流浪部伍成為雄踞荆、益兩州的地方勢力，除了他的個人魅力、軍事操作之外，一大部分的原因乃是劉備向來標榜漢室正統，強調自己討伐曹賊以扶正衰微的皇室之理想，從而號召天下英雄前來投靠、相助。劉備、孫權因為荊州問題大打出手，之後又掀起猇亭之戰的大規模惡鬥；其時漢王室仍受制於曹魏手中，劉備放棄攻擊曹魏反將目標轉移至孫吳，對於蜀漢的核心價值多少有些傷害。劉備兵敗後，蜀國國勢陷入低潮、人心浮動，此際精神層面的價值觀便更顯重要。諸葛亮竭盡其力盡早北伐，一方面為了修正被破壞的政治路線，掃除對於蜀漢立國基礎的質疑；另一方面也由此轉移國內焦點，舒緩自猇亭慘敗後，蜀漢整體所呈現的惶恐不安。綜合論之，蜀漢的存在與漢室的存在，在精神層面是休戚相關的。一旦漢室政權被解散，蜀漢的存在意義也將受到撼動；穩固蜀漢並延續其存在必要性的方法，自然就是對於「漢室迫害者」——亦即曹魏——發動最直接的戰爭，已此重新申張蜀漢的政治理想，並持續凝聚內部力量。

學者王夫之曾以「以攻為守」之說定義諸葛亮的北伐，認為北伐實際上只是為了鞏固蜀漢的防禦，使蜀漢得以長年偏安於益州。¹⁶⁰將這個理論置入前文中所述及之現實、精神兩層面的論述，以攻為守的北伐確實能夠為蜀漢增添更多資源；且即便諸葛亮並未打算與曹魏正式大規模交手，發動這類以進為退的戰爭，的確亦能滿足蜀漢的政治目標，平息人心的焦躁。然而，諸葛亮若純粹為了強化蜀漢國防而進行北伐，應以糧產豐富的隴右為主要攻略目標，何以第四次北伐採取褒斜谷路線？¹⁶¹本研究已針對褒斜谷的地形做過探討，其崎嶇狹隘的道路不僅後勤困難，一旦兵敗更有遭敵軍阻擊、截斷的潛在風險。蜀漢北伐軍若受到魏軍致命性的打擊，一來蜀漢精銳盡失、國防空虛，二來北部防線必因此出現嚴重缺漏。且筆者認為，以諸葛亮嚴謹慎重的性格與行事作風，若單純只為了強化蜀漢的防守，應不至於採取這類型高風險的做法；再者，這種形式的北伐並不可能為蜀漢帶來耀眼的成果，若為此鋌而走險，並不符合比例原則。

總而言之，北伐在現實層面中似乎是可有可無的行動，然而在精神層面，北伐對於蜀漢卻是舉足輕重的。無論是整合內部向心力、維繫存在合理性，北伐都是蜀漢延續命脈的重要手段，也是實踐目標的必經途徑。以這兩個角度探討，則北伐對於蜀漢而言，實是不可或缺的軍事行動。

¹⁶⁰ 王忠孝《諸葛亮政治戰略之研究》，前引書，頁 143

¹⁶¹ 王忠孝《諸葛亮政治戰略之研究》，前引書，頁 144

第三節 論北伐行動與蜀漢政權的整體關係

許多學者將蜀漢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北伐時期物資和人才的折損，另又將人才折損歸咎於諸葛亮的決策問題，於此筆者頗不以爲然。¹⁶²或曰諸葛亮斬馬謖有失公允，張大可先生更指出：「殺一馬謖已裁之失中，況又濫殺李盛、連作黃襲乎！」¹⁶³他以劉備欲殺蔣琬而諸葛亮勸阻之爲例，認爲既然蔣琬可寬待立功，彭縈、廖立、李嚴等人的去職可說是諸葛亮「忌人之長」的表現¹⁶⁴，也是諸葛亮北伐終究未能成功的原因。然而，蔣琬僅是行政工作怠慢，馬謖、李嚴則是在軍事行動中失職，彭縈、廖立則以不實言論蠱惑人心，兩者豈可相提並論？軍法較一般法規嚴厲，這是可以想見的；何況諸葛亮治軍尤其強調法治的重要，如何能法外開恩、暫且寬待？倘若諸葛亮忌人之才，他又何必表薦李嚴之子李豐接掌江州事務，且李嚴又何以在聞知諸葛亮病逝後抑鬱而死？¹⁶⁵

筆者認爲，北伐之於蜀漢，不僅是擴張國勢、延長國祚的通道，它的執行更爲蜀漢注入新的活絡氣息。以後來的南唐、南宋爲例，同樣面臨強大的鄰國，此二者選擇偏安一方、以合爲貴，終究導至國力衰弱、爲強敵所滅；蜀漢則不斷向曹魏發出挑戰，軍事組織嚴謹、國內法治昌明。雖然蜀漢終爲曹魏所滅，然及至諸葛亮北伐期間，蜀漢的國力與劉備掌握荊、益二州時，幾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相較之下，南宋則遠不及北宋的強盛時期。北伐使蜀漢官民同處於應戰狀態，生產和軍事結構也因此不至鬆懈怠惰。

猇亭戰後，劉備時期的謀臣將領，諸如法正、關羽、張飛等人皆已相繼去世；繼位的劉禪又未承襲劉備興復漢室的大志，在統治、攬政上略顯憊懶。蜀漢團隊頓時陷入困惑，迷失於劉備去世後，蜀漢應如何自我定位、擬訂發展路線。失去存在目標與發展方向，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是相當危險的。諸葛亮於此時以丞相之職參政，進而主導一連串的北伐，此問題即迎刃而解。簡而言之，北伐象徵的是單純而明確的政策，這項政策引導蜀漢完成其建國理想實踐步驟。其時蜀漢面臨存亡危機，北伐讓蜀漢重新確認自己的核心價值，這對於穩定國家形勢和民心是相當重要的。

姜維接替諸葛亮的職位後，北伐和蜀漢的關係則逐漸出現變化。諸葛亮時期，每一次北伐的時間點都經過挑選，多以曹魏朝中局勢變遷、或協同孫吳共同進軍；行動前，必先進行周密的前置作業，並針對前一次行動的缺失詳加改善；可以合理推論，諸葛亮所發動的每一次北伐，應皆曾進行仔細且慎重的沙盤推演、情勢評估。反觀姜維時期，行動間隔過於密集、動輒數萬兵員的軍事規模；而與魏軍多達十餘次的交手中，姜維始終未能克服補給問題和攻擊模式受限等障礙，其行動遂出現雷大雨小的狀況。

缺乏周詳的計劃，成功率也大幅降低，姜維的行動爲蜀漢帶來發展契機的機會也相對減少；在此情況之下，連年的大舉北伐反而成爲蜀漢國政和經濟上的一大負擔。加之姜維在內政方面不若諸葛亮幹練、亦未掌有實權，蜀漢在外部競爭與內部建設的平衡逐漸被破壞。蜀漢的滅亡，姜維領導的低效率進軍顯然難辭其咎，這或許也是後人批評北伐的主要原因吧！

¹⁶² 此處僅探討諸葛亮之決策問題。關於北伐爲蜀漢開創之契機，見本章第一節

¹⁶³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論諸葛亮出師〉頁 344

¹⁶⁴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前引書，〈論諸葛亮出師〉頁 345

¹⁶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第四節 小結

就歷史事實而言，北伐未能達到「北定中原、攘除姦凶」的戰略目標，也未曾獲得突破性的成就或勝利。接連的軍事行動中，蜀軍雖有屢次擊敗敵將的紀錄，但在實質領土擴張上建樹不多。諸葛亮奪陰平、武都，姜維徙河關、狄道、臨洮三地居民入蜀，這些確實是北伐的收穫，但與預期之成果相去甚遠。儘管諸葛亮善於經營管理，北伐對於蜀漢經濟的耗損仍是不可否認的，此負擔至姜維時期更是愈發困窘。然而相對地，北伐為蜀漢開創了新的契機，使蜀國整體因為這個契機而產生新的活力。諸葛亮為了完成北伐，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和統整，事實證明這對蜀國國力而言亦是不無小補。換言之，諸葛亮和蜀漢行政團隊，為了追求這個契機，在國政經營上投注不少心力，這對於蜀漢而言無疑是一種潛在的益處。

以精神層面探討，蜀漢的存在既立於興復漢室的基礎之上，則持續維繫其向心力的方法，自然也是延續其原先的目標。尤其當劉備過逝、蜀中動盪不安，實踐此政治理想遂成為穩定國勢的最佳良方。以此觀點切入，北伐行動顯然有其必要性：諸葛亮為強化蜀漢對其軍民的統治、確保朝中上下同心協力，勢必以「對抗曹魏」的價值觀重新聚攏蜀國之眾，北伐無疑是最有效率的體現形式。且考慮進攻路線的選擇和諸葛亮的個性，所謂「以攻為守」的策略應非北伐的真實意義。由此可見，北伐對於蜀漢而言，確實是其完成立國任務的必經之路。

北伐行動千年來受到許多史家批評，筆者認為主要肇因於姜維時期北伐行動的失當。將諸葛亮與姜維二人所領導的北伐相互比較即可發現，諸葛亮在戰爭前的籌備與規劃，遠較姜維謹慎得多。在未能有效改善問題、朝中政治紊亂等因素之下，才會致使北伐成為蜀末招致滅亡的原因之一。然而，這並不能代表北伐整體對蜀漢而言是不利的。

綜合以上分析和推論，北伐的意義不僅涵蓋勢力擴張、資源爭奪，更牽繫著蜀漢整體的興亡和國家力量的統合。經由北伐，蜀漢穩定了動盪的國勢，並在最初的政權基礎理論和現實情況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此外，北伐更使得蜀漢在劉備逝世之後的衝擊之後，回歸原有的團結和凝聚。這項軍事行動的開創性、必要性和象徵性，對於蜀漢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

由此，筆者認為，北伐對於蜀漢政權而言，應是一項正確且有利的行動。

第六章 結論

東漢建安二十四年(西元 219 年)，劉備已掌握荊州、益州，五月大敗曹操後接管漢中，七月自封漢中王。至此，劉備勢力盛極一時，但這輝煌的時刻並未維持太久：十月吳軍背約、呂蒙入侵荊州，十二月關羽被孫權所擒殺。荊州、上庸等地先後脫離劉備統治，及至建安二十六年(西元 221 年)劉備於成都稱帝時，其勢力已較漢中王時期為弱。同年劉備大舉伐吳，為陸遜大敗而歸，蜀漢國力一度跌到最低點。

其時蜀漢的困境遠比表面上來得複雜。劉備所主導的政治集團入蜀未久，然而益州地區的官僚體制卻已有相當沉重的歷史包袱，自漢代以來，積弊已深；且蜀漢之荆楚人士於益州紳豪屬外來政權，其間的利害衝突不可避免。劉備去世後，蜀中人心惶惶、朝中動盪；軍隊元氣大傷，邊防虛弱；頓失東吳盟友，外交亦陷入困境。

諸葛亮以顧命大臣的身分輔佐劉禪，是蜀漢實際上的統治者。在荊州被奪取之後，蜀國的發展已然脫離了諸葛亮原先設定的《隆中對》。劉備死後，諸葛亮重新修正蜀漢的國家方針，首先與東吳和好、恢復舊盟；整頓國家內政，維持荆楚、蜀中官員的權力均衡；討撫南中蠻夷，補充財貨、人力。以上種種措施看似容易，實際施行卻有其困難。然諸葛亮深悉蜀吳聯盟存在的必要和必行，藉由巧妙的外交手法，以不卑不亢的姿態和東吳握手言和；他精通管理經營，其行政、經濟政策皆得以切中時弊；諸葛亮更一改漢代單純武力鎮壓的態度，融合安撫拉攏的高壓懷柔戰略，將南中資源盡收己用。透過這些更新措施，有效重振蜀漢的軍政實力。

蜀漢國力恢復後，諸葛亮決心向曹魏發動侵略。單就北伐一事而論，仍是遵守《隆中對》所規劃的：進佔益州後向北進軍。不過形勢有所變動，蜀漢已無力依循《隆中對》中自荆襄、秦川兩路齊發的攻擊路線。荊州既失，隴右的戰略價值即相對提高。諸葛亮考慮涼州可能為蜀漢帶來的資源挹注，決心將北伐攻擊目標設為隴右。蜀漢建興五年，蜀軍大舉發兵，趙雲欺敵戰術奏效、涼州三郡叛降蜀漢。可惜馬謖敗於街亭，蜀軍為避免戰線全面崩潰，只得放棄戰果、盡數撤返蜀中。隨後的兩次北伐，蜀軍在魏蜀邊境發動小規模的區域戰，皆以奇襲為主、各有勝負。諸葛亮的最後兩次北伐形式轉為持久戰，雙方遙遙相望、僵持甚久，始終未有較大的變動，而諸葛亮也在解決這個困境之前，溘然長逝。

諸葛亮時代的結束，蜀漢內部結構亦逐漸轉變。蔣琬、費禕和姜維雖依序扮演類似諸葛亮的角色，但他們不若諸葛亮般，在內外兩部分都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後諸葛亮時期早期，朝中尚有董允端正政風、與軍事總帥合作；董允過世後，黃皓等人權力漸漲，及至姜維終於為其所逼退，內外行政分裂，無法進行有效率的策略統合。此外，蜀中人才日益枯萎，又缺乏外地新流輸入；姜維連年伐魏，缺乏完善的設計和規劃，對蜀漢國力形成龐大的負擔。蜀漢末年，姜維在朝政的影響力幾乎消磨殆盡。鄧艾、鍾會舉兵入川，蜀漢政府結構鬆散、防禦組織亦不完整，終於亡於鄧艾的奇兵突擊。

北伐是為蜀漢尋求契機的方法，也是其維繫存在價值的手段。透過現實、精神等層面的分析，北伐不僅具備創造機會的功能、更是諸葛亮不得不採行的策略。儘管北伐未能成功、對蜀漢的國勢亦有所影響，其為蜀漢所帶來的潛在益處也是不可忽視的。綜合各角度的觀點，筆者認為，北伐行動整體對於蜀漢政權而言，是一項利多於弊的行動。

參考文獻

- 晉·陳壽《三國志》
晉·常璩《華陽國志》
唐·防玄齡等《晉書》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
倪振金《諸葛亮聯吳制魏戰略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蘭州市
王忠孝《諸葛亮政治戰略之研究》，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
周一良〈論諸葛亮〉《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北京市
馬植杰《三國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市
宗樹敏《諸葛亮治蜀之研究》，台灣書局，1994年，台北市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昭明出版社，1999年，台北市
饒勝文《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北京市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上海市
萬穎中《三國蜀漢王朝的興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李奇龍《孫吳政權興亡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